

德文本出版者說明

这份报导的作者，是一位維也納的女記者，奧地利“人民之声报”的編輯。由于匈牙利事件对邻近的奧地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人民之声报”在1956年10月23日至12月底这段期間的緊張日子里，几乎不断地派出特派記者到匈牙利去。在10月23日与11月4日之間的一段時間內，在奧匈边境也經常駐有特派記者。作者参加了边境上的这种工作，并在10月23日至12月中旬之間的期間內在匈牙利采訪了六个星期以上，其中只有几次短期的間隔。

柏林狄茲出版社

目 录

是聖潔的火焰还是火災?	1
当大学生示威的时候	5
边境	9
界柵前过夜	13
火堆和絞架	23
厂主們来了	35
不冒烟的烟囪	44
敌人、騙子、眼前風头人物	56
亮着灯的窗和暗黑的街牆	73
力量的考驗	94

是聖潔的火焰还是火灾？

10月23日这一天，維也納依然是陽光灿烂，气候温和。虽然游覽季节已經过去，但是內城的馬路上仍然到处是外国人，他們在巡覽着櫥窗和名胜，或是用鍍光閃爍的厄斯普列索^①喝着咖啡。在凱尔特納街上和在格拉本^②，仍然像在游客最多的季节一样，听到講外国語比听到的德語还多。最近几个月来，大家除开習慣了听通常听到的外国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之外，也習慣了听捷克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和匈牙利語，因为奧地利与各人民民主国家間的行旅交通已經开始發展了。

閃閃發亮的汽車川流不息地駛过馬路。空气像夏天一样温和；市郊山丘上的葡萄，已开始成熟。接着一个安宁的夏天而来的，是一个温和的、安宁的秋天，也許跟着还会来一个爽朗的、宁靜的冬天。也許猜忌和斗争的时代的确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吧；也許相信有什么对立和敌意，就是一种錯誤了吧。而且，这种情况也許会永远在和平的交談和友好的諒解当中繼續下去吧；也許各个国家在将来会像維也納街道上来自全世界的平凡人們現在那样，彼此友好相待了吧。

① 厄斯普列索(Espresso)：是从意大利傳入的一种咖啡壺，以鍍制成，用蒸汽烹咖啡。——譯者

② 格拉本(Graben)：在維也納市中心，与凱尔特納街(Kärtnerstraße)交叉，市况繁盛。——譯者

是下午六點鐘了。暮色暗藍，路燈亮起了來。卡楞堡山^①上的燈光，像一條鑽石項鏈一樣在維也納高處閃爍着。最後一些玫瑰花的香味，從市公園里散播到全市。

在這個時刻，布達佩斯已經響起槍聲了。

外界的人們對這件事還知道不多。我們報館的編輯部裏面放着外國通訊，放着電傳打字機拍來的報導。波蘭事件仍然占着首要地位。從布達佩斯傳來的消息，只是說，起初被政府禁止了的学生大示威，終於又得到了許可。學生們歌唱着走到波蘭自由戰士和1848—1949年匈牙利革命軍的將領貝姆的紀念碑前面，獻了花。同時，有人高呼波匈友好的口號。後來，也有人在自由詩人裴多菲的紀念碑前獻了花，並發表了演說。有些演說者要求把由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特別是由裴多菲俱樂部的成員所提出的十六點綱領付諸實施。這個綱領中，包括了恢復匈牙利國徽、取消學校里的軍事訓練課和俄語課、恢復匈牙利舊國慶日等項要求。另一個消息說，十六點綱領當中並且要求讓匈牙利政治家納吉·伊姆雷參加政府，並要求舉行自由選舉。在示威過程中，喊出了要納吉主持政府的口號。最後，示威和平地散開了。

不久，維也納電台就在晚上報導說，匈牙利首都爆發了戰鬥。據說，武裝的警察曾向手無寸鐵的大學生開槍；有許多人被打死和受重傷。接着居民就拿起了武器來。維也納電台的廣播員津津樂道地說，“匈牙利正在起來反對為人所痛恨的共產黨政權”。

誰也不重視這個消息。好多個星期以來，電台幾乎天

① 卡楞堡山 (Kahlenberg)：維也納城郊的名勝。——譯者

天發出报导，一下子說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發生了什么起义，一下子又說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發生了什么起义。几个星期来，这些屢經証明是無中生有的报导，数量大为增加。如果照維也納电台的說法，那就再也不会会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

在下半夜，这个消息重复宣布了一遍，而且补充說，布达佩斯全城进行着巷战。清早的时候宣布說，匈牙利政府已經要求苏軍援助，并宣布了戒严。

这已經太具体，不像是宣傳式的报导了。似乎确实出了些事情。但是布达佩斯电台說些什么呢？布达佩斯电台在沉默——或者只是播送音乐唱片，接着还是播送音乐唱片。中欧的人們近二十年来經歷了許多次在唱片音乐伴奏下發生的反革命政变、占領和战事，所以这种音乐对他們來說是一个恶兆。这表示有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或是有外力在妨碍着正常广播节目的进行，所以才用音乐唱片来填满一个又一个节目的時間。不久，真正的广播节目来了。这些广播是惊心动魄的：“在夜間，反革命匪帮襲击了各个企業和公共建筑物。許多工人、士兵和市民被杀害了。我們原先对这个进攻沒有准备，因此根据华沙条約，要求駐在我国的苏联軍队协助我們恢复安宁与秩序。苏联軍队答应了我們的要求。”

接着宣布在匈牙利全境实行戒严；內政部长宣布在布达佩斯在下午两点鐘以前禁止出門。向暴乱分子提出了一份以下午两点鐘为限的最后通牒。凡是在时限以前放下武器的，将不受罰；凡是在时限过后仍然繼續战斗的，将受軍事法庭审判。后来最后通牒又延长到下午六点鐘截止。

十点鐘，宣布改組政府。中午时电台已經發表了第一

批由納吉·伊姆雷以總理名義簽署的公報。十二點零五分，納吉發表演說，在演說中要求停止這場只會導致無謂流血的戰鬥，他並宣布說：“反革命分子和他們煽動下的青年，已經與人民政府為敵了。”政府的呼呼和號召，整天不斷地重播。裡面三番四次地說，這場暴亂是反人民的。

這是 23 日說的話。但是過不了幾天之後，廣播電台以及納吉總理和他的朋友們所談的，不再是反革命匪幫了，不再是对士兵、工人和市民的屠殺了。他們所談的，不再是受了煽動的青年了，不再是反人民的暴亂了。布達佩斯電台在 10 月 24 日下午一點半鐘發表的聲明中說，蘇軍被政府請到布達佩斯來幫助鎮壓反革命運動，他們現在不顧生命危險來保衛匈牙利人民的利益，但這個聲明以後也沒有重播過。

因為，過了短短幾天之後，反革命暴亂竟變成了一個“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光榮的人民起義”。反革命匪幫竟變成了“手執武器保衛祖國”的“英勇的自由戰士”。被殺害的人們不再被提到了，那些不光是像 24 日電台廣播所說的那樣為了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而不顧生命危險，而且還在這段期間有許多犧牲了的蘇軍士兵，也不再被提到了。反之，談的卻是什麼“起義的聖潔火焰”，並且開始聲稱，蘇軍“用武器來對付人民，目的是要把自由鎮壓下去”。

哪一種說法對呢？是布達佩斯電台和納吉總理最初的那些說法對呢，還是他們後來的斷言對呢？拿起了武器的是些保衛人民民主制度並且——照當時所聲稱的——希望這個制度“清除過去的罪行與錯誤”的自由戰士呢，還是一些希望把整個人民民主制度連同“人民民主制度的錯誤”一起除掉的人呢？暴亂究竟真是一種“聖潔的火焰”呢，還

是一場有計劃地点燃起来的、要把整个匈牙利燒掉——而且不光是匈牙利——的火灾呢？10月23日究竟發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当大学生示威的时候

一个星期后——布达佩斯还在战斗中，每隔几分鐘就听到机关槍咯咯地响——我們在布达佩斯一座窗戶被打碎、牆上彈痕累累的住宅里，与23日事件的一位目击者对面而坐。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曾經和他的学生一起参加过那次已被正式宣布为暴乱导火綫的大学生大示威。我們詫异地問：“怎么？你这位老共产党员竟然也参加了这样的示威嗎？”他也同样詫异地回答：“当然啦，我們全都是应党的号召去参加这次和平大示威的。教授和学生参加大学的示威，工人則参加全市的大示威。”他这么一回答，使我們第一次吃了一惊。（后来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們向我們証实了这一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确發出了这样的一个指示。）“你們說这是一个和平的示威嗎？”我們問，“好一个竟演变成一場暴乱的和平示威！”“那可不是的，”教授辯解說，“是事态的發展完全变了样。”

下面就是他关于10月23日大学生大示威期間發生的事所提供的报导。在这次大示威之前，22日就有过一次短促的自發示威。学生們涌到波兰大使館去，欢呼波匈友誼。这次示威进行得十分安宁。23日的示威是早在好几天以前就預定了的，在示威中将要公布学生和知識分子的全面要求——十六点綱領。这个要求綱領，将由一个代表团随后遞交給政府。但是，早在几天以前，就可以觉察到有些什么

事情正在醞釀着。陸軍好些軍火庫里的軍火失了踪，其中有許多機關槍。在 22 日的示威开始后，一些絕非學生的人曾企圖混入學生的游行隊伍里去，喊了“共產黨人滾出去！”、“猶太人滾蛋！”、“赶走俄國人！”等口號。（這時候布達佩斯並沒有蘇聯軍隊，當時蘇軍正集中在根據華沙條約所規定的駐扎地點。）學生們赶走了挑釁者，但是每個人都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覺，覺得有點蹊蹺。

由于這個緣故，教授們在 23 日早晨接到通知的時候，並不十分感到詫異，這個通知說政府已經禁止了這次學生大示威，因為由于軍火失竊，無法保證這個大示威安然進行，而政府又有責任保護青年的生命。學生們對這個禁令當然不很高興，他們在高等學校里舉行集會，要求解除禁令，並再一次重申他們的要求。許多教授，其中包括校長和副校長，在學生集會上講了話，維護了政府的決定。在開會期間，不斷有人到來，自稱為外省其他大學的代表（學生們對這些代表一個也不認得），要求違抗禁令，上街游行。斐多菲俱樂部也派了一個代表團前來，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教授們終於說服了學生，當他們正要回家去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通知，說政府又准許了這個示威。當時是一點鐘。學生們成群走上街頭的時候，知道了有些印刷廠被一些成群結隊的來歷不明的人占領了，城內好幾處地方已經在開槍射擊。但是，既然政府已經允許了這個示威，學生們當然不會停留不前。大約一點半鐘的時候，游行開始了；一些學院和高等學校——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的學生們舉着紅旗，一直齊聲高呼：“提防挑釁分子！”但是局面已經完全大亂。下午四點鐘左右，這個示威不再是什麼學生示威了。各種各樣的人——起初是個別

的，后来是成群結队的，全都不是学生——混进了游行队伍，要求政府辞职，要求苏軍撤出匈牙利，甚至要求退出华沙条約。偶尔有人喊口号要求由納吉主持政府，又有人吹口哨并叫喊：“赶走共产党人，打倒犹太人！”

天色慢慢地暗下来。忽然四面八方發出了一陣喊声：“广播电台那边在战斗！”，接着又是第二个喊声：“有人向人民开枪！”四面八方都叫喊着：“我們到国会大厦去！打倒杀人凶手！”忽然出現了一些滿載火炬的卡車，有人从卡車上跳下来，动手把火炬分發給学生。本来示威預定在四点钟亦即在白昼的时候結束，但是，竟然有人早就已經知道，“广播电台那边在战斗”这一个呼喊声，将会使示威延长到天黑，并且使它变成国会大厦前面的一个突襲式的示威。这一点竟有人早就知道，而且早就連滿載火炬的卡車也准备齐全了。火炬点着了，队伍往国会大厦进發，人群中有一些人喊叫說，應該用这些燃着的火炬把国会大厦燒起来。不过学生们仍然沒有听从这种煽动。人們呼口号要求由納吉主持政府；最后納吉从里面走出来，告訴他們說，正在着手成立一个新政府，他叫学生们安靜地回家去。于是学生们就歌唱着回家。这就是事情經過的全貌。

这真是事情經過的全貌嗎？不。因为就在这时，一些由大卡車运送的全副武装的人群，在市內其他部分同时占領了下列目标：陆軍中央軍械庫、陆軍中央电訊站、广播电台大厦——就在这里，襲击者和电台警衛人員之間实际上發生了最初的战斗，战斗是由襲击者把一枚手榴彈扔进房屋而挑起的。同时，“自由人民报”的报社和印刷厂，以及一些火車站，首先是两車站，也被占領了。当学生在和平示威的时候，成群結队的武装分子正在夺取一些在战略上占重

要地位的建築物——奪取軍械庫，从中取得武器；奪取陸軍電訊站和廣播電台，从而使陸軍和政府至少一時無法發出消息，最後又奪取各個火車站，使政府無法通過鐵路調兵增援布達佩斯。這是一個在戰略上經過周密考慮與準備的計劃。學生的大示威跟這個計劃沒有多大關係。只不過是這個大示威轉移了居民和政府的注意力，從而在這點意義上造成了一道帷幕，在這帷幕的掩蓋下，真正的暴動開始了。

下午九時左右，那些後來自稱為“起義者”的人組成的集團，已經在屋頂上和閣樓上布好了陣地，向房屋和街道放槍射擊。在夜里，射擊稍為緩和了些；大概是有人趁這時候布置陣地，并把從軍械庫中奪得的武器進行分發。早上射擊又重新開始了——一直不再停止。

這是一個目擊者的報告。後來其他和我們交談的人，也報告了同樣的情況。各處的示威開始的時候都是比較和平的，各處都是有一些成群結隊的人混入，要求驅逐“共產黨人”和“俄國人”，而且往往還要求驅逐“對一切過錯都要負責任的猶太人”；各處的示威最後都被一些成群結隊地突然出現的武裝分子變成為一個暴動。曾經在西車站附近停留過的工人告訴我們說，有十幾輛坐滿武裝分子的載重卡車忽然駛到車站前面，那些武裝分子喊着“Mut Szalassi!”（“希特勒萬歲！”的匈牙利版），占領了這車站。後來國務部長馬羅山告訴我們說，早在23日之前很久，在布達佩斯就有人散發一些地圖，上面畫着一個大匈牙利，把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和南斯拉夫很大一片的領土劃了進去，後來，在23日，一些成群結隊的前霍爾蒂分子參加示威的時候，喊着“不，不，永遠不！”（匈牙利民族主義者的老口號），並要求

与西德締結軍事联盟。

从所有目击者的报告中，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結論：23日燃燒起来的，不是聖潔的革命火焰，而是反革命的火灾。10月23日爆發的不是爭取自由的战斗，而是反对人民的战斗。

边 境

24日……，25日……，26日……。匈牙利来的消息，越来越自相矛盾。电话通訊几乎一直中断，电报通訊也一样。有一次，匈牙利官方電訊社“匈牙利電訊社”（MTI）的电傳打字机通了几小时的报，把局势作了一个簡短的介绍。据说政府已經牢固地控制住局势，虽然还有零星的抵抗，但不会支持很久了。保衛企業的工人武装队的成立和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維持匈牙利社会主义秩序的牢靠保証……。接着报导就中断了。后来我們才知道，为了爭夺“匈牙利電訊社”的電訊發报地点广播大厦，这一天又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一次战斗間息的时候，“匈牙利電訊社”的編輯就主动向我們發送了这段安慰人心的报导。

工人武装队、革命委员会——这些话听起来是很能令人放心的。直到很久以后，我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从10月24日早晨起，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間的边境实际上封閉了，沒有人出来，也沒有人——暂时來說——进去。27日，边境的栅栏忽然打开了，一队由十五輛汽車組成的队伍离开了匈牙利。他們是外国人，主要是商人，他們由于23日的事件而被阻，沒有能够离开布达佩斯，直到現在才得以离开匈牙利。

邊境上已經有頭一批來自全世界的記者、特派記者和攝影師在等候着。後來幾天，他們的人數增加了好多倍。他們拿着隨時准备好拍照的照相機，擠到汽車隊周圍。上鏡頭特別多的，是一輛窗口打破了、護輪蓋碰凹了的汽車。“俄國人的機關槍打的，”車主，一個西德商人，裝作泰然自若地說，“打了好些發子彈，不過損害不大。”另一個旅客站在旁邊，輕聲說：“別信他亂說。昨天當炮火停息了一些，他就和他的朋友們一起試圖开到城里去；而且去之前他們還在旅館里喝酒壯壯胆——忽然之間他們跟一輛蘇聯裝甲車撞了車。假如他們當真遭到射擊，他們就會是另一副樣子了。”

那位西德商人和他的汽車現在被四面八方拍進了鏡頭。現在這位“俄國機關槍的受害者”向一些西德和美國的記者發表一篇談話。這時候我們請問其他旅客，打聽是否還進行着厲害的戰鬥，因為布達佩斯電台又報導說，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抵抗巢穴”了。他們迅速而不加思索地回答：“戰鬥啊！多厲害！比開始的時候還要劇烈得多！”

幾小時後，我們從第一批來自布達佩斯的目擊者口中聽到第一個可靠的報導，介紹截至27日上午為止的局勢。市內仍然在戰鬥，不但使用了輕武器，而且也使用了機關槍和大炮，暴亂分子擁有的機關槍和大炮一定很不少。蘇聯軍隊似乎奉了命令盡量不干預，只有在直接受到攻擊的時候才動用武器。（後來表明，這個揣測是正確的：納吉政府雖然在23日夜間向蘇聯軍隊求援，但是它接着又向蘇軍給予種種矛盾的指示，所有指示都只有一個內容：蘇軍不應進行任何真正的戰鬥。蘇軍指揮部所持的立場是：一個友好政府求它援助，所以它應該執行這個政府的指示，尽可能滿足這個政府的要求——而這是以前許多蘇維埃人的生命為代價

的。) 反之，暴乱分子不但从城内各处的屋頂小窗和居高临下的倉庫向四面八方射击，而且还在他們觉得必要的时候和地方，在人口稠密的街道和廣場上架設大炮。对一些建築物，如“自由人民报”、广播电台、好些政府部門，爭夺战仍在进行中。守方处于劣势。他們是由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干部、从前的国际縱队队员、从前的抵抗战士組成的。他們中間有来自軍隊与警察的老共产党员以及来自附近企業的工人，他們在战斗还未达到高潮之前就迅速赶到了这些建築物里来。

陸軍很大一部分保持中立。他們既不帮助暴乱分子，但也不进攻他們。許多士兵站在街头，袖手旁觀。順便提一句，数以千計的布达佩斯人也站在馬路上觀望；射击特别厉害的时候，这些人就躲到有掩蔽的地方里去，只要射击稍为緩和些，人們又走出来。平民在这时候遇难的大多数就是站着觀望时中了流彈。

正如后来所判明，那位目击者的报告，在这几点上也是真实的。他所当然不知道的，是那些保衛公共建築物、政府各部以及后来保衛党各个办公大樓的战士们，在10月25和26日曾經接到过命令，要他們“为了結束流血”而馬上交出所有武器。这个命令来自納吉总理的政府和国防部，这个部在这些日子里已經处于納吉集团的分子和一些自称“無党派”而实际上則靠擺暴乱分子的職業軍人支配之下。不少共产党员从紀律性出發，执行了这个命令，不久之后，他們就無法抵抗而被那些当然保留着自己武器的暴乱分子所殘杀。

有战斗决心的工人不得不从企業里跑出来保衛那些受到进攻的建筑物和党办公大樓。这个事实，正如后来同样

表明了，在局部意义上来说，产生了很不幸的后果。因为当工人们战斗的时候，外面来的恐怖集团占领了许多企业。这种占领有时候并不曾得到那些在战斗期间留在企业中的工人的同意，有些也得到那些把武装分子当作朋友的工人的同意。在另外一些企业，从前的霍尔蒂军官、从前的箭十字分子、大地主子弟、从前的大小企业主，就到处宣布他们要重新负起保卫企业之责——当时已经没有人来阻止他们了。

从布达佩斯回来的目击者继续叙述下去说：根本就看不到政府的报纸、招贴和党的招贴。这或则是因为大多数的印刷厂已经被暴乱分子所占据或者像“自由人民报”印刷厂那样仍然是一个战斗争夺的目标，或则是因为当时那里没有人能够或是愿意印刷报纸和招贴。（第二天电台果然报导说，“自由人民报”将来将以一份胶版印刷的通报的形式出版，并“只供党内使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就是这样自愿地转入非法状态，这是一个很确凿的征象，说明党的瓦解竟到了多么厉害的程度。）

代替了报纸的，是别的一些新闻工具——是由暴乱分子出版的。这是一些贴满各处墙壁并且每天甚至往往每小时都更换的标语和招贴。许多宣言是由一个“学生青年委员会”签署的，另一些是由一家刚刚获准出版的接近斐多菲俱乐部的晚报的编辑部签署的，另外还有一些是由一个“作家委员会”签署的。几乎所有宣言都要求纳吉·伊姆雷辞职，有些宣言把他叫做“伊凡·纳吉约夫”，以表示他是从属于苏联的。别的一些宣言宣布了要求纲领。其中要求一个“自主的匈牙利”，要求修订匈苏和匈南经济协定，苏军在二十四小时内撤退，“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选举，引渡拉科西并

交付法庭审判，解除国家警察的武装，以及諸如此类等等。也有一些标語和招貼，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要求，例如恢复匈牙利国庆日，但另外也有一些直接要求西方以派遣联合国部队的方式实行干涉。并没有什么标語和招貼出来反对这种宣傳。

“唯一幸运的地方，”我們那位目击者最后說，“是西方的人大概还没有考虑过对匈牙利动手实行干涉。在这样一种混乱当中，他們本来只需要派进几个反动政客，只需要派进几千个武装流亡分子，就可以在几天之内把政权掌握在手中了。”

西方人真的还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么？我們这位目击者关于布达佩斯的报告，正如后来表明，是确实的。但他对西方的计划和行动的揣測，也正如后来同样迅速地表明，却是完全不正确的。

界柵前过夜

紧紧靠着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地点尼克尔斯多夫，是一个倦倦欲睡的小村，鵝和鴨在它的中心大街上散步。从10月23日起，尼克尔斯多夫变得面目全非了。

从23日开始，西方通訊社立刻向全世界發出了触目惊心的报导。报导里說，匈牙利在流血，匈牙利在餓死。还說，布达佩斯成千成千的人在死亡，因为医院里再也没有藥品，沒有綑带，沒有手术器具，沒有麻醉藥，沒有血浆。城里妇女和兒童在死亡，因为沒有牛奶，沒有脂肪，甚至沒有面包。

在战斗的日子里，布达佩斯無疑挨了餓，但是这些触目

惊心的报导却并不屬实。牛奶是缺乏的，但面包却从来都不缺，在全部战斗的日子里，农村都一直在供应馬鈴薯、蔬菜，甚至肉类。关于医院和关于缺乏綑带、抗生素和麻醉藥品的报导，是完全失实的。正如后来布达佩斯最大的医院之一的主任医师向我們說明的，虽然外来藥品很缺，但是包括抗生素在內的匈牙利国产藥品从来不缺。有个故事說，在布达佩斯的医院里，由于沒有麻醉藥品，只好不經麻醉就动手术，他認為这个故事是一种拙劣的捏造。但恰恰这个故事在几十家报纸上受到大事渲染，描繪得有声有色，震惊并煽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震惊、同情、詫愕——这就是那些关于匈牙利的灾难的报导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到处都几乎自發地展开了筹募錢物救济匈牙利的工作；接着，紅十字会、工会、政府很快就發出了呼吁。几万、几十万人贈款捐物，因为他們願意帮助匈牙利人，因为那些报导匈牙利苦难的消息使他們感到切膚之痛。筹募地点积下了許多包裹。于是开始向边境运出第一批物品——面包、罐頭、藥品、綑带。据說很快会有車从匈牙利开来把救济品領走。

对处在困难中的邻居是應該帮助的，对他們的痛苦是應該減輕的，不問受苦的人姓甚名誰，屬于哪一个党派。这就是数以万計的普通人的想法，这就是他們的目的，他們的意志。但是另外有些人也抱着自己的目的，而对这些人來說，問題并不是什么援助不援助。

那是10月27日到28日之間的夜里。小小的尼克尔斯多夫村已經面目全非了。在离村口一公里多的地方，开始排着一列停留的車，界柵前的村大街上挤滿了人，每隔几分鐘就閃亮一下閃光；因为二十四小时以来有几十个新聞

攝影記者、几十个特派記者从全世界各地聚集到尼克爾斯多夫。紧靠边界的那座小客寓的酒吧里座無虛席，在舞厅里，士兵們在地上垫起柴草睡覺——联邦軍隊派出了最初几支队伍来到边境，“以防止意外事件”。

在酒吧的一些桌子旁边，坐着一些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彼此輕声地用匈牙利語交談。这些人的臉容，这些人的相貌，是每一个維也納人都認得的。这是一些好几年来蟻集在維也納的匈牙利流亡分子咖啡館里度日的人，是一些早在两三年——有些人还要更早一些——以“逃避共产主义恐怖的难民”的身分到了奥地利来并从那时候起一直在維也納居住的人。从他們穿的衣服，从那些女人戴的首飾，从他們以最豪华的咖啡館与飯館为其經常駐足之地这一点看来，可以断定他們的生活过得相当优裕，虽然沒有人能說得出他們是靠什么过得这样闊气的。

忽然，坐在桌旁的人們开始动身，这个房間就空了，他們全都站在界柵前面。国境綫另一端的無人地带亮起了汽車头灯的灯光，灯光来得渐渐近；两輛、三輛、四輛匈牙利汽車向奥地利的界柵駛来。“这是前来取藥品的自由战士和医生”，一个边境宪兵說。但是，从匈牙利汽車里下来的人，并不到国境边防哨站来。他們若有所找地四顧張望。不久之后，他們每一个人都被三四个从匈牙利流亡分子咖啡館那里来的人包围着。流亡分子替他們作翻譯，替他們与奥地利当局交涉；一个“自由战士”被几个从維也納来的匈牙利人引到一輛停着等待的汽車那里，汽車亮了头灯，开足馬力向維也納进發。

就在这段時間內，客店的房間又挤滿了人。从匈牙利来的匈牙利人和从維也納来的匈牙利人在桌子旁边彼此紧

挨着交談。过了一回兒，一个从維也納来的匈牙利人叫那些等候着的記者进客房去。“少校先生現在要向諸位簡單报告一下布达佩斯的局势”，他用一种新聞發布官的口吻宣布說，并指了一下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褐色皮大衣的男人。“怎会是少校呢？他們不是来取藥品的医生嗎？”我問。“新聞發布官”窘起来。“他是一位少校軍阶的軍医”，他迅速地回答，并作出了一个凶狠的臉色。少校談了几句，“新聞發布官”翻譯說：“他告訴諸位，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一个新政府，总理是納吉，还有小农党的两个代表。教育部长是卢卡契·捷尔吉，他是个共产党人，但是一个很出名、很正派的人。內务部长也是一个共产党人，仍是暫时的，不是长期的。布达佩斯的战斗正在接近結束——只剩下小批共产党秘密警察还在抵抗，但估計再过不了几小时就可以收拾掉他們。其余的大多数都放下了武器，因为他們知道自己是被打敗了。女士們和先生們，还有什么問題要問嗎？”

我發問說：“什么共产党秘密警察呀——战斗是对付他們的嗎？但我們在广播里不是听說斗争是为了爭取民主的嗎？”“新聞發布官”作出了一个恼羞成怒的臉色，很威風地說：“談話結束了。”

当天晚上，从匈牙利来的汽車和卡車的数目大为增加了，在尼克尔斯多夫村里或村前停下的那一串汽車也增加了。其中有許多架耀眼地带着薩尔茲堡或是上奧地利的車牌。

从上奧地利和薩尔茲堡当真来了这么多的救济品么？卡車大多数都不是貨車，而是客車，而且还是滿載乘客的客車。在上奧地利，住着許多从匈牙利来的日耳曼人，他們大都是由于参加过德国国社党、党衛軍或其他納粹組織而

不得不在1945年离开匈牙利的。他們在上奧地利定居下来，他們在上奧地利有一个最强大的組織——一个匈籍日耳曼人的联合会，它要求讓“被逐者回到解放了的匈牙利去”。他們当中有許多人是—些半合法的納粹組織的成員，这些組織的地点也設在上奧地利，例如“論壇社”，这是西德某个前党衛軍分子联合会的一个兄弟組織。

反之，在薩尔茲堡落籍的，却不是匈籍日耳曼人，而是“匈牙利难民”。这些在两年、三年、四年或五年前从匈牙利来的难民，名义上是要轉道到美国或加拿大去定居，但实际上却没有去。在奧地利国家条約締結前的那几年間，他們被美国人收容在薩尔茲堡城內和城郊的营地里。在这些营地里，“难民”們受到軍事訓練或間諜訓練。在这些营地和匈牙利之間，有着活躍的非法来往；不断有間諜派进去，过—段时间再出来，并帶另外一些人出来受訓，再派进去。这些营地的人可說是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专家。美国人撤退后，这些营地并没有解散。它們現在正式称为“移民营”，不再隶属美国占領当局，而改为隶属美国私人組織。里面住的人却仍然是从前那些。

但是一两天以来，这些营地几乎都空了。“难民”們忽然無影無踪了。他們的失踪，与現在不断到尼克尔斯多夫来的大批薩尔茲堡載客汽車有没有关系呢？

汽車排得越来越长。夜里和第二天，来了一些有新車号的汽車，几乎全是西德車牌。但是那些从这些車上下来的人，却大多数不說德語，而說匈牙利語。据通訊社的某些报导，那些收容匈牙利人的西德难民营，也忽然空了。

从匈牙利到奧地利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們有的挂着步槍或是手提机关槍走到界柵前面来，然后在踏入中立的

奧地利領土前彬彬有禮地把武器放在路邊——正像一位紳士在臨踏進飯館時把自己的帽子放在衣帽間一樣。因為按照國際法，奧地利應該把踏過國界的武裝人員加以拘留。但這一來，他們就免除了奧地利當局這個麻煩。

這些人現在監督着如何把包裹和小箱從那些停在奧地利界柵之前的車子里轉載到匈牙利的載重汽車里。起初奧地利的邊境職員和憲兵曾企圖檢查轉運的貨物，至少也要提出一些問題，問清楚箱子和包裹里面究竟放着些什麼東西。但是雙方都是這樣亂哄哄，不斷開來開去的車堵塞得這樣厲害，以致經過了一些時間之後，那些職員們不得不打消了任何檢查的企圖，只好听听一輛已經轉載了貨物的汽車的隨行人員簡單地報出“藥品”或是“綑帶”甚至“救濟品”，就算滿意。最後，這些職員變成了交通警察，只要他們能把國界柵欄前的交通指揮得好，不致有兩車相撞，他們就算高興了。

後來蘇聯和匈牙利方面曾經屢次宣布說，有武器、彈藥和“志願兵”從奧地利進入匈牙利支援匈牙利的反革命。奧地利政府每次都憤怒地抗議，並宣告自己與這種運輸毫不相干，從沒有組織過任何輸送武器的事情，從來沒有允許過輸送志願兵。實際上說來，它是說得對的。它的确既沒有組織過，也沒有允許過這樣做；事情原來簡單得多，甚至可以說，漂亮得多。奧地利政府只不過是沒有派人加強邊防與海關卡口而已，這個卡口原有八至十人，處理平時的工作是綽綽有餘的。現在這幾個人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當然還是無法檢查邊境上的這件大規模的事業——他們簡直是被淹沒了。雖然調了聯邦軍隊到邊境，但是無論是士兵或是軍官都沒有被派來協助邊境職員。這畢竟也不是他們的

份內職責。他們要做的事是注意不讓任何敵人越過國界并進攻奧地利。而由於誰也沒有最微小的要進攻奧地利的企圖，所以他們或則閑着沒事看熱鬧，或則和尼克爾斯多夫和附近一帶的姑娘手牽手在村里大街上或是田野上散步。

問題因此不在於有沒有運送武器或是運送反革命分子到匈牙利去，而在於應否派人加強一個邊境關卡。這並不是政治問題，而只是一個純粹行政技術性的決定，一個不觸及任何人的純粹內部措施！依靠干脆不理會或則嚴格遵守辦公規章的方法，來搞小政治或大政治，在這樣的手法上面，奧地利各級政府官員是擁有好幾十年的經驗的。

幾天過去了。邊境上是這樣混亂，以致連轉載那些貨車運來的貨物也不可能了。不過這也不再需要了。——從10月28日起，邊境實際上開放了。人們可以隨意從奧地利驅車進入匈牙利，要進去多遠就多遠；奧地利的職員們無法檢查任何人或是任何事情。在匈牙利方面，在這段期間，邊防哨已經被一個“革命委員會”的“可靠的”人員所佔據，誰也不打算實行檢查。在23日之後最初幾天，奧地利方面的人還有點顧忌，當時只准一輛汽車在奧地利和匈牙利之間不受障礙不受檢查地來來往往，這是“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的廣播車。28日之後呢，誰願意來來往往，誰就可以來來往往。當然還是有一個條件——只有運載救濟品的汽車、紅十字會的汽車才能行駛。但是，如果需要的話，“紅十字會”是可以成為一個廣闊無邊的概念的。

雷塔河畔的布魯克，是匈牙利邊境上最末一個較大的地點。從28日起，一直有人經過布魯克。在離布魯克還有幾公里的地方，停着好幾十輛汽車。大多數是普通汽車，奧地利、西德以至其他國家的載貨汽車和載客汽車。車旁有

人在工作。他們拿起一幅白布，用紅顏料在上面畫一個紅十字，把布糊在冷卻器蓋上，然後開走。顏料鉢和毛刷子留下來，供後面來的人共同使用。在許多場合，他們甚至不費神帶白布來；一張白紙或是紙板也就對付過去了。這樣，一支“紅十字會運輸隊”就組成了，不會再受檢查了。可以隨意要帶多少乘客就帶多少乘客，只要在邊境上聲明這是“救濟人員”，別人也就不再問下去。幾十個國內國外的新聞記者、政治家——還有一些抱著曖昧目的的人——都這樣以“救濟人員”的名義坐着“紅十字會汽車”到了匈牙利。整個整個的團隊，也可以這樣暢通無阻地派進來。

10月30日，我們坐車到布達佩斯去。我們幾乎是在一大隊汽車隊里駛行的。我們前面和後面都拖着一大串這樣的“紅十字會汽車”。假如這些車全是載着藥品和綑帶，那麼，這樣多的物品，就足以在一場厲害的天災的情況下，不光是救濟匈牙利一國，而且還救濟整個東歐和中歐。但這些汽車只要有百分之五真的是紅十字會汽車，也就算多了。

11月1日，這件事情已經鬧得太臭氣熏天了，使得奧地利當局只好下令派憲兵對進入尼克爾斯多夫的人實行檢查。不過，前些時候，“奧地利人民之聲報”這份唯一報導過邊境開放情況的報紙，却曾經由於“叛國”而被沒收——這是杜爾福斯時代之後第一次以叛國罪名沒收報紙的事件。憲兵的檢查稍為阻止了汽車的洪流——在這一個地點阻止了。但過不了幾天，人們走小路躲開了哨崗，或是不沿從前那條尼克爾斯多夫——赫杰斯哈洛姆的路而沿克林根巴赫——索普倫的路進行運輸。這些運輸，直到11月4日前夕夜里，一批“紅十字會汽車”忽然迎面遇到了蘇聯坦克的

时候，才停止下来。于是边境上终于平静了。

在这些日子里，不光是从奥地利利用汽车运送了人和物品到匈牙利去，而且也有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从匈牙利到奥地利来。在维也纳，在10月25日至11月4日这段时间内，可以看到比往常一年之内所看到的还要多的带有匈牙利车牌的汽车。在马路上可以比过去任何时间都听到更多的匈牙利语——而这些客人却绝非游客。

在这些日子里，最反动的匈牙利政客之一纳吉·费伦茨也到维也纳来了。在美国，有一个从各人民民主国家逃亡出来的政客的委员会，主席是反动的波兰政客米柯莱契克。米柯莱契克曾以委员会的名义向美联社宣布说，纳吉·费伦茨飞到奥地利去，是为了从维也纳动身前往匈牙利，在匈牙利“与自由战士们进行商谈”。后来奥地利政府宣布说，没有让纳吉·费伦茨继续前往匈牙利去，并且已经要求他离开奥地利国境。的确，纳吉·费伦茨在维也纳逗留了两天，就到瑞士去了。他是心安理得地这样做的，因为他已经会谈过了。不是在匈牙利会谈——但也根本不必如此做。“自由战士”们到了维也纳来找他——大概是坐着一辆汽车来的，车上挂了一块白布，上面有人用红颜料画了一个十字。

但是，在大多数场合，“自由战士”们并不需要到维也纳来进行会谈。他们心目中的那些重要人物本来就安坐在尼克尔斯多夫。我们举一件事来加以说明。

10月28日星期日，在尼克尔斯多夫靠着边界的小客店里，来往的行旅络绎不绝。几乎再也听不到一句德语，整天只听到匈牙利语。下午的时候，来了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深色的人，颧骨显著地凸出，双眼窄小而深暗。他走进门来，

所有的举动都像一个军官。他穿着一件棉短外套，两襟敞开，里面露出一条带子。他的外表十分漂亮，正像人们想像中的一个“自由战士”的样子。他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来到了。由于他的外表这样漂亮，所以一些西德的摄影记者就马上向他一涌而上。他友好地微笑着让人家给他拍照。另一个陪着他的匈牙利人用德语介绍他，说他是吉厄尔行政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然后他与我們一一握手（我坐在西德摄影记者们那一桌，他大概是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个了），叫陪他的人转告我們说，他几小时后就要再“到他的朋友这里来”。

现在他又来了，伴随他的是另外一个匈牙利人和一个中等身材、穿着垫了毛皮的用轻气球网料制成的短外套的人。这个“自由战士”认出了我，高兴地向我点首招呼，并做个手势请我到他那一桌去。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啦？”他耸耸肩头，有点惋惜地说：“Nix deutsch。”（德语“Nicht deutsch”的不正确发音，意为“不懂德语”。——译者。）我于是转身向那个穿着轻气球网外套的人，请他来翻译。当他也支支吾吾说出“nicht deutsch”的时候，我忽然心血来潮，用英语接着说下去。他大概是一时没有准备，就用一种道道地地的美国式英语来回答我，他的英语带有强烈的美国南方口音。马上他注意到了自己原来是冒充什么的，于是就住了嘴；但是这时候他那位莽撞的“革命委员会”的朋友兴高采烈地指指他，讲了几句匈牙利话，于是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匈牙利人就翻译说：“他说，这位先生是个好人。是我们的首长。他告诉我们匈牙利人该怎样做。他一向是匈牙利的老朋友！”那个穿着气球网外套的人作出了一个脸色，仿佛恨不得把我和他这位鲁莽的部下扼死似的；他向这位

部下怒目而視，这个部下說了一些話为自己辯护，这些話的意思大概是：“但是您要怎样呢？在这里朋友中間这样做做有啥关系呀！”我告辞走开。走到門口，我遇見了一家大通訊社的同業，他是以認得奧地利境內每一个声名不大揚的国内国外人物而著名的。“你曾經看見过这个人嗎？”我問，并用头部的动作来指出那个穿着气球網外套的人。同業笑了。“当然啦！你不認得他嗎？他是‘自由欧洲’电台薩尔茲堡分台的新任美国台长呀。”

火堆和絞架

10月30日，我們到了布达佩斯。在从边境到首都的路上，我們几乎看不出發生过些什么事。农民正在进行着最后的田間工作。路旁的牧場上一大群一大群的羊在吃草。池塘里成千上万只肥胖蹣跚的鵝昂着头雄糾糾地游着水；它們还不知道聖馬丁节^①很快就要来临，到时它們的鵝命就要一命嗚呼。沒有什么地方在战斗，沒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战斗行动的一絲痕迹。只是沿途的工厂的烟囱都不冒烟，冷冰冰地矗立在空空的、死寂的厂房上面，各处城市的街上都閑站着成群的人，一声不响，好像等待着什么似的。驟然一看，好像是到了一个节日中的城市，市民像在馬路上和廣場上無所事事地閑蕩；但是經過一回兒就可以發覺到，气氛不是节日的气氛。人群太沉靜、太严肃了。听不到笑声，但也听不到吵鬧声，听不到咒罵声。人們只是站在那里，等待着什么事情發生。什么事情呢？我們向他們当

^① 聖馬丁节，一个宗教节日，在11月11日。——譯者

中一些人詢問的時候，他們只是聳聳肩頭。

途中我們的汽車屢次被武裝哨崗攔住。他們大多數佩帶紅白綠三色臂帶，上面有一個科蘇特章。這些綉了精巧徽章的臂帶，在 23 日後成千上萬地忽然出現——全都是同樣的規格。誰也不知道這是從哪里來的。這些臂帶已經準備好放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應用——正如別的許多東西一樣。

攔住的時間不長。哨兵們瞧一眼我們車子的冷卻器蓋上的紅白紅旗，頂多再瞧一眼我們奧地利護照的封面，就向我們友好地示意，叫我們繼續前進。在這些日子里，奧地利在匈牙利暴亂分子當中十分吃香——這並不是普通人民的奧地利，而是另外一個奧地利，在這些日子里，有人等待着從這個奧地利那里得到援助，不過這些援助並不是綑帶和藥品。“聯合國軍隊已經在途中了嗎？”有些哨兵問我們。“美國人來了嗎？”另外一些哨兵這樣問。往往他們單刀直入地問我們：“你們會讓他們過境的，不是嗎？我們得到了諾言，說奧地利會讓援軍過境！”

一直到布達佩斯的市界，我們還看不出任何破壞，只是一些房屋上挂着紅十字白旗，上面寫着字，表明這是一處救護站。但是景象接着很快就改變了。街上遍地瓦礫和碎玻璃，電車的架空天纜打斷了垂了下來，翻倒了並且燒壞了的電車擋住了路，打破了的窗戶露出黑洞洞的缺口。在瓦礫和碎玻璃當中，在翻倒了的電車和燒毀了的汽車當中，在翻開了的路面旁邊，還有成千的人站在馬路上，似乎是在等待着什麼事情發生。

接着，又聽到隔着幾條街的那邊響着機關槍聲；響起來，又停了；停了，又響起來——當中又響了幾聲步槍聲。

街上的人甚至不躲到有掩蔽的地方去，他們对槍声已經听慣了，現在能够分辨出槍声是在近处还是在稍远的地方發出的。好多天来一直如此；人們在战争时期和內战时期是會很快就学到东西的。

槍声是从上面，从屋頂上和倉庫楼上来的，在大多数場合，是無目的乱放的。在这一天，正如在其他日子一样，在布达佩斯彼此作战的，一方面是武器优良、受过軍事訓練的暴乱分子队伍，另一方面是由党工作人員、工人和士兵組成的小批武器拙劣的队伍，他們仍旧在保衛着各个建筑物、政府部門、党办公大楼和一些企業，抵抗着比自己大許许多倍的力量。在这一天，例如“自由人民报”的大厦就第三次受到襲击，几乎完全被破坏了。这一天的上午，暴乱分子开始向布达佩斯党市委大楼实行总攻。在这一天，切佩尔工厂也發生了战斗——整队整队的暴乱分子在前霍尔蒂軍官的指揮下試圖夺取这个企業，厂里有十七名工人据守防御，一連好几天打退了屢次的进攻。不过这一切的战斗都是在別的城区进行的，离我們所在的地点相当远。我們所听到的槍声，跟这些战斗毫不相干。这只是向街上盲目射击，大概是为了不讓居民安宁，保持住一种經常的內战气氛。从暴乱开始时起到結束时止，这种射击一直有系統地在所有各处进行着。这些射击究竟夺去了多少無辜过路人的生命呢？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还不能說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匈牙利政府当局說，有几百人成了这个“心理作战法”的受害者而死掉——有妇女、兒童和老人，他們到街上去，是为了买一点点面包，也許是为了买一份干乳酪。但是西方的报纸和西方的广播电台却借此大事宣揚，說什么“在整个布达佩斯，人們在英勇地对共产党人和俄国人作战。”

踏过鋪滿了瓦砾的馬路，踏过地上乱七八糟的电綫，我們試圖到广播电台大厦去。也許那边还有人，也許那边还在工作。但是我們到了下一个街角就無法再繼續前进了。一大群人封鎖了馬路——更准确地說，这是一支游行队伍，人数約一百到一百五十人，举着一面紅白綠旗帜。这支队伍四周圍着几千个看熱鬧的人。稍远的地方，一座房屋前面升起了一股濃烟。这座建筑是苏联出售外文書籍与俄文書籍的“展望”書店的大楼。“展望”書店一般并不出售政治性的报刊，而是出售世界文学的著作、艺术書籍，首先是关于世界繪画与雕塑的書籍，还有很多音乐作品。

小小的游行队伍开到了“展望”書店，搗毀了門市部和書庫，把剩下的家俱、圖片，首先是几千册圖書，拋到街上，澆上汽油，点着了火。于是現在街面上燃燒着一堆大火。

在火堆的边上，有一本很大的、裝訂得很好的書。火焰正在开始燒到它，一頁封面热得卷縮起来，張开了。在已經在变为褐色的扉頁上，可以看到書名。这是莫扎特的“菲加罗的婚礼”的节录譜和歌詞，是为了紀念莫扎特誕生二百周年而出版的。偉大的詩人們曾經告訴过我們，这一出歌剧是“不朽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曲”，現在呢，火焰燒到了这本歌剧，這本書燒着了，成了灰烬，正如 1933 年德国納粹分子的火堆上的書籍被燒着、成了灰烬一样。

“展望”書店并不是在这一天被燒掉了的唯一的藏書的单位。在此之前不久，同一群人搗毀了匈苏协会大楼，把圖片、杂志、書籍——包括一套优秀的技术与医学丛书——都放在火堆上燒掉。紧接着，他們又在艺术史研究所燒書。“自由战士”們显然本来就有濃厚的燒毀圖書和艺术作品的癖好——24日“光荣的人民起义”正是以这样的一件事开始

的：“自由战士”們縱火焚燒了国家博物院，并三次用机关槍火力赶走那些企圖把火扑灭并把無法补偿的艺术珍品搶救出来的消防人員。

不过，在10月30日这一天，还开始發生了比燒書更加可惡的事情。大概就在“自由战士”們通过燒毀“菲加罗的婚礼”来明确肯定自己厭惡“沒有心灵的共产主义独裁”并喜爱自由西方文化的时候，爭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大楼的战斗，正在接近血腥的結局。

在布达佩斯市委大楼，从事变前一天起，有一支約四十人的衛队，其中有許多二十至二十一岁的年輕士兵，另外还大約有四十名党的干部和職員——其中有很多妇女。从前一天起，就已經知道进攻馬上要开始，因为早在前一天晚上就有一些区委办公大楼被襲击。約在下午七点鐘的时候，一群群武装分子在市委大楼四周聚集，作出要襲击这大楼的样子。这时候，大楼前面还停着一輛装甲車，这是国防部派来的。当大楼警衛队把危險通知国防部的时候，还来过一些軍官，組織起保衛大楼的工作。进攻停住了。

30日清早，国防部不知道因为什么緣故，忽然把装甲車撤走了。一小时后，武装分子又来了。在对面一座剧院的屋頂上不声不响地設立了一个机关槍陣地。在附近的房屋里，暴乱分子也占領了一些倉庫，設立了射击陣地。

市委大楼里的干部打电話到国防部，指出他們面对着一个占十倍优势的敌人。国防部答应援助他們，但是同时声明說，不能确实知道援軍什么时候能开到。这些干部在此期間，應該設法保衛大楼。

布达佩斯党組織的書記、老共产党员麦澤·伊姆雷就在这座大楼。共产党员、国防部成員陶斯·拉約什上校先

前已經到了市委大樓來，打算在這裡組織保衛本區各企業的工作，麥澤和他二人匆匆忙忙地把幹部和士兵們安插到窗戶和門口的地方，並且分發給他們彈藥。現有的彈藥不多——而當時局勢又十分危急；因為過了十點鐘之後不久，攻擊就開始了。大樓在兩個鐘頭之內一直受到步槍和機關槍的射擊。在這段時間內，守方一個接連一個地擊退了進攻。雖然大樓里和走廊上已經躺着許多死人，而且無數同志受了傷，但看情形這大樓還可以再守一些時候。就在這段時候，麥澤屢次與國防部通電話，屢次要求援助——但屢次受到拖延。

十二點鐘，圍攻者運來了大炮，架設起來轟擊市委大樓。幾分鐘之後，大樓就處在炮轟之下。炮轟一共延續了幾乎兩小時之久。於是情況就很清楚，守方單靠自己的輕武器，是不能再對抗炮兵的了。大樓牆上開了很多大洞，走廊上和好些房間里着了火。麥澤再一次打電話到國防部去。回答是：“我們無法援助你們。”

現在只好停火了。麥澤和兩個軍官——其中包括陶斯上校——向進攻者喊叫說，他們將以國會議員的身份前去接洽移交事宜，於是拿着一面白旗走出了大樓。對方讓他們一直走近進攻者隊伍前面，然後開槍把他們射倒。兩個軍官馬上死了。麥澤幾小時後也死了，死前一直昏迷不省人事。

麥澤的妻子也是黨的一個高級幹部。當別人把她丈夫的屍體送回家的時候，她在死者身邊一直坐了幾個鐘頭。然後她站了起來，離開了家。她擠到那些在街上排隊買食物的婦女的隊伍當中，同她們辯論，努力向她們解釋說，這次暴亂只是有利於人民民主制度的敵人，只會引來外國的干

涉。好几次她被人認了出来。暴乱分子喊着“打死这个共产党婆子”，向她扑过来，她只好跑开——跑过了几条馬路，在追逐者放开了她之后，她又参加到别的队伍里去，又从头开始解释。几天之后，麦澤的寡妇和别的一些同志一起，在本区成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临时小组。

但我们还是把话题轉回来，談談市委大楼吧。这里的屠杀开始了。那些手無寸鉄、举着双手离开大楼的士兵和干部，都首先被帶到进攻者的大炮前面几公尺的地方。然后进攻者就喊着“打死他們，他們是国家保安警察”，向他們扑去。他們被打倒在地上，被脚踐踏，被槍托痛打。然后他們被綁起来，吊在大楼前面的树上。一个受了重伤、从大楼里爬出来的工人被捉住，被两脚朝天地倒吊了起来。繩子断了，这个垂死的人被踐踏到死。有些年輕的士兵被用槍托子打碎头盖骨，然后又把他們的党証塞在他們嘴里，另一些士兵被砍掉了头。好些工人，其中包括老干部阿斯托洛什·亚諾什，被挖出了心脏。党校领导人拉卡托什·彼得起初被开枪打倒，然后在垂死的时候还被用槍托打击。至于当时在大楼里的那些妇女，沒有被杀害的，大多数都受到了虐待，以致不得不在医院里躺好几个星期。她們当中的一个，考拉伊·艾娃，当一些“自由战士”打算开枪把她打倒的时候，她从二楼的窗口跳到洼地里去，受了重伤，躺在路面上。

市委大楼前的大屠杀，并不是这些日子里开始并且在后来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的唯一实例。在布达佩斯的工業区切佩尔，同样在30日这一天，正当企業本身仍然由工人保衛着的时候，許多再也無法及时赶到工厂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干部，被拖出了自己的住宅，在市場廣場上被絞死了。他們当中的一个——早在1918年就曾为匈牙利苏維

埃共和国战斗过的工会工作者卡拉馬尔，和他的妻子、兒女以及八十岁的老父母一起，被吊死了。这个被吊死的女人还被从尸体里挖出心脏，扔在广场上。这一天，在别的地方也有干部、士兵和普通工人被杀害。

在离奥地利边境不远的馬扎罗瓦尔，这一天在一座政府大厦被襲击之后，有許多警察職員在市場广场上被吊死，另外一些，在第二天經過所謂“軍事法庭审判”之后，也被杀害。在馬扎罗瓦尔和别的地方，屠杀的理由都是：“保安警察在人民当中进行了一場大屠杀”。这个理由，在叙述 10 月 25 日布达佩斯發生的意外事件时被一字不差地加以重复。暴乱分子利用这个意外事件来作为理由，發动了对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瘋狂迫害——这个事件，就是国会前面的所謂大屠杀。

直到 25 日为止，絕大多数居民的情緒是平靜的。他們希望实行某些改革，祛除过去的錯誤，但是沒有誰想挑起一場战斗，所謂自由战士們的暴力行动，普遍受到反对。因此，就必须制造出一件意外事件，来引起一种惶惶不可終日的气氛，使人們感到“我們如果想拯救自己的性命，就必须战斗”。同时也必須出点办法来挑起强烈的反苏情緒，而这种情緒过去是沒有的。这件事的發生經過如下：

10 月 25 日午后不久，在国会前面举行了一个和平示威。据說將由一个代表团向納吉政府提出一些要求。来了些学生、青年，也来了好几千看熱鬧的人。国会前面停着苏联坦克。坦克炮塔的頂盖是打开的，士兵們在秋天下午溫和的陽光照耀下站在坦克前面的街上，和聚集在国会前面的人們交談。当时是一种十分和平的气氛；坦克手們和布达佩斯的人們笑着彼此交談，交換烟卷。一个少校，坦克队的

指揮官，也站在那里談談笑笑，一面抽着一根香烟，一面和一些大学生在交談。忽然从国会左方一幢房子的頂樓里射來了一顆子彈，少校倒在地上死了。就在這一剎那，好像這一槍是個訊號似的，從對面和鄰近的房子的屋頂和頂樓那里居高臨下地向廣場射來了一整梭的機關槍子彈。接着馬上射來了第二梭，第三梭。士兵們跳進他們的坦克，開火還擊。開闊的廣場上沒有任何掩蔽的可能，因此當時就亂成了一團。在混亂和射擊當中，死了几十個人，另有許多人重傷。射擊過後還不到半個鐘頭，到處的牆壁上都已經貼滿了傳單和招貼。里面宣告“俄國人”和保安警察血洗了和平的布達佩斯居民，並號召居民對“凶手”們作戰。即使傳單的作者和印刷者以最快的速度進行工作，這段時間——半小時——也是太短了，不足以使這些傳單能在射擊過後印刷出來。這一定是在人群與蘇聯士兵還在國會前面友好地交談的時候就早已準備好了的。

關於“保安警察”曾經向人民開槍的說法，一絲一毫的證據也沒有。在這些日子里，僅有的一些的保安警察隊伍，都被調來集中在國會大廈里面，以便保衛政府和設在國會大廈內的各部。但是射擊不是來自國會大廈之內，而是來自國會大廈對面和國會大廈附近的房屋——來自私人建築物。一直沒有能夠查出是誰爬上那里的頂樓並從頂樓向下射擊的。居民說，這些人拿着機關槍沖進房屋，佔據了頂樓，他們在國會大廈前的槍擊還在進行當中就溜跑了。

這個挑釁起了作用。在那群情鼎沸的、被謠言和狂熱所激動的布達佩斯，人們在傍晚就已經談論有几百人被打死和几千人受傷；人們說，蘇聯軍隊未經先行警告就向人民開了火，還有人說自己的確看見“保安警察”向示威者開槍。

从此，就开始了对苏联士兵的直接袭击，从此，任何一个被認為是保安警察的人，都成为人人得而誅之的对象了。

国会大厦前的大挑衅，在后来——几乎完完全全依样画葫蘆——又在馬扎罗瓦尔和别的許多地方重演了。在馬扎罗瓦尔，30日那一天，也是在政府大厦前面举行了一个和平的大示威，这个示威在这处小地方更加像是政府大厦前面廣場上的一种閑游。政府大厦由士兵和保安警察人員守衛着，他們分布在大厦里面和前面。在馬扎罗瓦尔，也是居民和警察人員和平地交談着，在馬扎罗瓦尔，也是忽然从对面和旁边的房子里向人群和警察人員射出了机关槍。在馬扎罗瓦尔，也是警察开火还击——而且，在馬扎罗瓦尔，也是死伤多人。不过，在这里，射击之后，“自由战士”們就冲进政府大厦去，把士兵和警察押出来，把他們打死一些，另外把許多人吊死在廣場的树上。另外两个受了伤的，在第二天被絞死了。其中的一个伤势很重，連走路也不能走。他被抬到絞架，扶起到絞索上。当他的頸子已經套上了絞索的时候，他高呼：“社会主义匈牙利万岁！党万岁！”接着人們放开了他，絞索就勒紧了。

在30日以后的日子里，挑衅性的槍击已經不再需要了。受害者也不再是在經過一場武装战斗——例如市委大楼的保衛战——之后被屠杀的了。暴乱分子开始搜捕士兵、軍官、著名的党干部，或則在街上當場抓住，或則依照一些細心列出并經长期准备的名单，把他們从住宅里押出来。于是馬路上整天發生同样的事件：有某个“自由战士”指着一个被捕者，喊叫說：“他是个保安警察，他杀害了好几百人！”于是别的許多人就向被捕者扑过去，把他打死，或者把他吊死在树上。在这些日子里偶尔發行区区几份、不是供人購

閱而是貼在牆壁上的報紙，就叫罵什麼“人民對保安警察兇手們的正義伸討”。作家協會出版的一份過去研究美學問題和發表優雅詩歌的刊物，十分“幽默”地描寫“布達佩斯的聖誕樹”，並且解釋說，“聖誕樹”這個名稱，現在是指布達佩斯的那些掛了保安警察的屍體作為裝飾的樹。在布達佩斯的主要街道之一的列寧大街上，“自由戰士”們開槍打倒了一個站在坦克里的蘇聯士兵，把垂死者拖了出來，用汽油澆到他身上，在上面點着火。有人在吊在一棵樹上的燒焦了的屍體上掛上了一張紙牌：“烤俄國人肉，入場參觀僅收三個費來。”

這裡已經舉出“人民對保安警察的伸討”的某些來由。但是另外還有一些來由。匈牙利國家保安警察，是暴亂分子所挑動人民去集中痛恨的對象。西方報紙，甚至一些本來是進步的人士，也把這種對保安警察的仇恨，把數百個國家保安警察和千百個人由於被指責為國家保安警察人員而被殺害這一事實，用來證明保安警察的確由於它過去的“罪行”而受到居民的痛恨。這也被用來進一步證明匈牙利事件不是什麼反革命，而在基本上是居民對“拉科西政權的罪行”所抱的正当憤怒的爆發。究竟保安警察是怎樣的呢？的確，在過去時期，一些保安警察的成員犯了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過失。同樣，的確，在過去，一些腐化墮落的分子混進了保安警察。但是正如後來在保安警察當中進行的調查所確鑿不移地證明的，這樣的人為數是極少的。大多數的保安警察人員都是忠誠的工作者，他們忠心耿耿地執行自己的職務；保安警察的軍官當中，有許多參加過西班牙戰爭的戰士、參加過抵抗運動的戰士、隨時隨地都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工人階級事業的人。

在無产階級專政下，那怕是多么良好的、多么正直的国家保安机构，也是会受到痛恨的——受到無产階級專政的敌人的痛恨；它越是好，它就越受到痛恨。因为它的目的是保衛社会主义国家、鎮压或逮捕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这样一种斗争，势必要而且自然要引起敌人对他們的对头的痛恨。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历史例子，从苏維埃政权早年期間的“契卡”看出来。“契卡”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偉大的革命家捷尔任斯基曾經为“契卡”这个年輕的苏維埃政权的国家警察創造过一句格言：“一个‘契卡’人員需要三件东西：冷靜的头脑、火热的心和潔淨的手。”“契卡”与工人階級、与苏維埃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是从它們的队伍里产生的，和它們合作，經常受它們的監督，特别是受党的監督。它从来不是一个为自己而存在的組織，而永远是革命的一条伸长的手臂，是工人及其政权的保衛者。这个“契卡”受到了本国旧階級的成員和全世界反动派多么切齿的痛恨和多么恶毒的誣蔑啊，它是多么經常地被指責“用自己的血腥行为沾污了純潔的革命”啊！这个指責是从工人階級的敌人那兒来的；但是有許多正直的人也上了这个当，他們不能够設想到：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光在革命期間，而且在革命之后，还是需要強力的。

因此，不言而喻，在匈牙利，保安警察也是受到社会主义政权的敌人所痛恨的，这些敌人并没有在1945年从匈牙利消失得無影無踪，正如苏維埃政权的敌人并没有在1917年消失得無影無踪一样，而且他們也像1917年苏維埃国家的敌人一样，并没有一下子就丧失掉自己对其他居民階層的影响。这些敌人在1956年終於在全面的大混亂中得

以制造出对保安警察的迫害狂，煽动人们相信：恨保安警察人员，虐待与屠杀他们，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不是反革命行为——难道保安警察没有“沾污了纯洁的革命”吗？

但是也有一些人，如纳吉或他的在斐多菲俱乐部里的朋友们这样的冒牌共产党人，他们参加了这种做法，大声疾呼地叫嚣：“消灭保安警察”。斐多菲俱乐部的人们把自己的联盟冠上了1848年时代伟大的匈牙利自由诗人的名字。斐多菲的诗不光是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爱，而且也充满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可是斐多菲俱乐部的人们虽然口口声声提到他的人道精神的传统，但却不仅在纳吉政府的日子，而且在这个政府垮台后还用下面的话来为屠杀与拷打辩护：“这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一些保安警察罢了！”

在10月28日和29日，受害者往往还的确是真正的保安警察。就是在30日，当时开始的对工人干部的全面大屠杀，也一直是在“跟保安警察算账”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过了一两天之后，在许多场合已经再也不用麻烦谈什么“保安警察”了，而是对所有共产党人都公开实行白色恐怖了。在“反对保安警察”的口号下，反革命得以比较畅通无阻地开始实行恐怖，一直到为时已经太晚，无法加以制止。

厂主们来了

那是午后不久。布达佩斯街道上的射击厉害起来了。到处都听到沉重的炮弹声。但是在多瑙河畔那座主要由外国人寓居的大旅馆里，人们熙熙攘攘地来来去去。餐厅也挤满了人——那些衣冠楚楚的先生们坐在桌子旁边，样子既不像“自由战士”，甚至也不像匈牙利人。

那个坐在旅館柜台后面的人，不管外面响着槍声，神情仍然十分泰然。“你們会看到的，一切都很快会安靜下来，”他友好地表示說，“到时就会有秩序了。有新秩序。”

这家旅店几天之前是完全空無一人的。先前在这里投宿的外國公司和外國貿易团的代表們都已經和別的外國來賓一起在他們自己使館的保护下坐着結队的汽車离开了匈牙利。但現在旅館又客滿了。新來的是些什么客人呢？

“外國新聞記者，”招待主任得意地回答這個問題，“還有以觀察家身份到这里來的外國先生們。還有一些是領導救濟事宜的女士和先生。還有，”他以一種講私房話的神情彎過身子來，輕聲說，“一些經濟界的先生們。是工業界一些很重要的先生。我們終於感覺到我們這家旅館又會成為一家體面的外賓旅館了——不像從前那樣了。”

這位坐在柜台后面的人，在前幾年一直緬懷着過去的好時光，那些使他感到自己的旅館可以成為一家“體面的外賓旅館”的經濟界和工業界的先生們，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呢？那些夾着厚厚的豬皮公事包在餐廳里和大客廳里商談着的先生們，並不以坐在旅館的大廳里為滿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這些日子里忽然在布達佩斯的企業里出現。後來布達佩斯企業的工人們曾經向我們略為介紹過這些人的活動。

在布達佩斯，有一個過去屬西門子康采恩所有的大企業。10月29日，一位從西德來的華爾特·馮·西門子先生忽然在那里出現，宣布他是來收回自己的企業的。對於一些工人提出的問題，他回答說，接收的事情已經商妥了，是“在上面”商妥的——當然還要等幾個月西門子公司才正式收回這個企業，但是原則上已經取得了那些“有決定權的

先生們”的最后許諾。他接着又勸工人們選出一個工人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由他來提名——這樣做法，就可以保證職工與廠主們的精誠合作，他知道，他是與一些正派的工人打交道，而不是與共產黨人打交道。日後當談判工資問題或是企業可能縮減的問題時，他也將注意到這一點。

只有一部分工人當時在廠——他們被吓倒了。他們選出了馮·西門子先生所提名的工人委員會主席——一個從前的霍爾蒂軍官，並選了一個副主席，這是一個工程師，照馮·西門子先生的說法，這個工程師是“一向忠於西門子家族的”。在11月3日夜間，馮·西門子先生無影無蹤地不見了，再也沒有人匈牙利看見他。依他的建議選出來的工人委員會却繼續工作了好幾個星期，甚至派出了代表參加布達佩斯中央工人委員會。

馮·西門子先生的例子，並不是一個例外。在別的許多過去屬於外國特別是西德公司所有的企業，例如在一家過去的瓦格納—比羅企業，在這些日子裡忽然出現了從前廠主們的代表，並宣布很快就要接收企業。

他們全部深信大功告成，他們全都談到他們“從上面”取得了“最后的諾言”。當然，11月4日之後，再也看不見他們的蹤迹了。

我們動身回奧地利去。每几公里又站着挂了步槍和戴着紅白綠臂帶的崗哨，他們看見我們的奧地利國旗的時候，就友好地示意可以繼續前進。只有一個哨崗問我們要護照看，把護照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隊長抱歉地說：“奧地利的先生們請原諒我們打擾，因為我們想阻止那些壞蛋們坐外國汽車逃出布達佩斯。”我們問他指的壞蛋是什麼人，他回答說：“哪，是共產黨人、黨的幹部、企業和集體農莊的小組

长先生們——他們不是那么容易能够逃出我們这里的。”“那么你們如果捉到了他們，要怎样对待他們呢？”这个人的手作出了一个橫越頸子的动作——砍头的动作。他笑起来，但是他的双眼發出了冷酷的、凶狠的亮光。

在吉厄尔，一大群人挤得水泄不通地站在中心廣場上，听着一篇从市政厅大厦里用扩大器广播出来的演說。發表演說的人，是霍尔蒂軍官紹莫季瓦里·拉約什。照他的說法，10月30日这个傍晚的时刻将会作为吉厄尔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而載入史册，因为紹莫季瓦里到吉厄尔来，是为了在这里宣布成立一个脫离匈牙利其余部分而独立的西匈牙利共和国。

“自称为政府的納吉·伊姆雷的政府，”紹莫季瓦里叫鷄道，“并沒有任何宪法根据。支持它的只有二万个武装匪徒和杀人犯。拥护我們的却是整个国家。我們已經决定就在今天在这里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由它来执行国防部和內政部的职权。我們的政府委員們已經宣了誓，我們的临时政府很快也要宣誓就职。在我們队伍中，不要那些在过去十二年統治我們的政权中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的人……我們坚定不移的目的是馬上与外国政府建立关系。我們正在向各国政府派出一些有純潔、明确的匈牙利民族感情的信使，他們用自己最后的一滴血来代表我們的祖国……”

市場廣場上的人們默然地傾听着，但是好些人帶着一副憂郁的臉色。他們似乎不喜欢这篇演說。紹莫季瓦里繼續說下去。他宣布說，新的临时政府在最短期限內就会在国外拥有一个电台。此外，“自由欧洲”电台还将号召全世界的匈牙利人起来支援。但是，要号召的还不光是匈牙利人。“我們呼吁一切外国人，一切爱自由的外国公民起来組

織志願縱隊、志願的自由戰士軍團，因為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紹莫季瓦里這樣叫囂說，他接着並且補充說：“這並不違反聯合國憲章，因為在行動中站在我們一方的不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一些自由的公民、獨立的自由戰士縱隊。我們請求自由歐洲電台把這一點也廣播出去。他們應該立刻與今天在紹莫季瓦里領導下即將在吉厄爾成立的革命政府建立聯繫。”紹莫季瓦里還宣布說，新政府將會得到巨額的外國貸款。無論是納吉的軍隊或是蘇聯坦克，都是“很容易趕跑”的。接着他再次要求外省其他地區“與即將在吉厄爾成立的政府取得聯繫”，並馬上派遣代表前來。再過幾小時，新政府就要開始工作了。

不過，在這一點上，正如不久之後表明的，從西方來的霍爾蒂軍官紹莫季瓦里是看錯了。他沒有估計到吉厄爾革命委員會里面一些人的反抗。這些人，包括委員會主席西拉格希·阿蒂拉（不要把他與那個在尼克爾斯多夫向薩爾茲堡“自由歐洲”頭子請示的所謂吉厄爾地區革命委員會主席混淆起來），誠心誠意地希望產生一個新的、更好的、但首先是社會主義的匈牙利。紹莫季瓦里的演說，向他們表明了，“自由戰士”們對這樣的一個匈牙利是不感興趣的。“這就意味着匈牙利的分裂，這就是說，我們要成為朝鮮第二，這是我們不願意的，”他們表示說；當紹莫季瓦里和他的匪幫揚言要逮捕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逃到了吉厄爾的大汽車廠，向工人請求援助。工人們雖然罷工，但是他們也不願有一個西匈牙利共和國，不願變成朝鮮第二，所以他們也表示說：“我們不允許這樣。”因此，紹莫季瓦里和他那一幫人就不得不推遲成立西匈牙利共和國。他們開始輪番進行磋商和恐嚇，一會兒答應給予革命委員會的人們以新政府中的

職位，一會兒又宣告說，這些人如果不接受這些職位，他們就要把全吉厄爾的人都開槍打死。這樣又拖了幾天。在這段期間，紹莫季瓦里匪幫從西方得到了增援；整隊整隊的從西德難民營來的箭十字分子忽然出現了。到周末的時候，情況已經很清楚，紹莫季瓦里的“政府”已經決定，如果情況不變化，就放棄取得革命委員會贊同的企圖，必要時血洗吉厄爾的居民，首先是血洗汽車廠的工人，最後宣布“西匈牙利國家”的成立。但是11月3日夜間，最初一批蘇聯坦克駛過了吉厄爾，“西匈牙利政府”連一槍都來不及放就煙消雲散了。

紹莫季瓦里演說完畢之後，中心廣場上的人群慢慢地散開了。我們繼續往邊境進發。在赫杰什哈洛姆的匈牙利邊防哨還有我們以前認識的一些同志（第二天他們被趕跑了，由一隊“自由戰士”接管了邊境的防務）。這些同志很沉默，臉色蒼白。他們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經過了一會兒，他們才對我們的問題反問一句：“你們沒有聽到電台廣播嗎？”當我們搖頭的時候，他們當中的一個非常輕聲地說：“完了。一切都完了。匈牙利不再是人民民主國家了。”

國界的另一邊也有一個擴大器，它這一次却是興高采烈地播送奧地利電台的廣播，重復地說：“匈牙利不再是人民民主國家了。”納吉政府宣布了立即退出華沙條約，同時用最後通牒方式要求蘇軍撤出匈牙利。它宣布了允許一切政黨存在，包括資產階級政黨，並從速舉行普選。其中，小農黨和安娜·克特利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參加了臨時政府。在一個向報界的聲明中，納吉補充說，匈牙利將按照奧地利的榜樣宣布中立，已經請求西方大國立即給予經濟援助。納吉在聲明的末尾還說，他對於政府要求蘇軍援助這件事，

是沒有責任的。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員，也不是政府的成員。

这个声明是撒謊。当 23 日晚上决定請苏軍来的时候，納吉不但已經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員，而且已經是政治局委員。在深夜召开的政治局會議上，納吉主动而且毫無保留地主張必須向苏軍司令部求援。后来他要求別人“为了与暴乱分子实行停战談判”，不要談到这个事实。明尼赫、卡达尔和其他共产党人滿足了他的願望。現在納吉却竟然靠了这一点来誣蔑那些与他一起邀請苏軍协助鎮压反革命的人們为“罪犯”和“卖国賊”。

广播的声音繼續响着。我們恨不得把它关上，但是办不到。根据由納吉签署的一个命令，明曾蒂被釋放并完全恢复名誉。和他一起被釋放的还有艾斯特尔哈齐伯爵，这个人曾經占有匈牙利土地的一半和奥地利的几乎整个布尔根州^①。明曾蒂被前呼后拥地送回布达佩斯。明曾蒂向人群祝福，并宣布必須恢复古老的法权关系，把土地这种“辛勤得来的財產”不但完全交还给教会，而且还交给所有地主。

維也納的报亭上張挂着报纸。报纸上也是大字标题：“匈牙利人民民主已届末日”。它們說对了沒有呢？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11 月 2 日……。在边界上，在尼克尔斯多夫和克林根巴赫，几乎再也看不到紅十字会的制服和徽章了。在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們不用这些了，他們在上衣的翻領上或是在臂章上带着一个箭十字分

^① 布尔根州(Burgenland)是奥地利东南的一个州，紧接匈牙利，人口中五分之四操德語，其余操克罗地亚語与匈牙利語。

子的徽章。和他們一起的，是一些穿着美国軍服的人——這是一些剛剛从西德来的匈牙利人。他們隨身带着行軍包，聚集在海关大厦前面。他們在等候着向匈牙利进發的当中，端詳着別的在場者，要求宪兵們向“可疑的人們”——奧地利人在內——索閱證件。宪兵們执行了他們的要求。箭十字分子带着嶄新的、在西德填發的护照，大概沒有人向他們索閱匈牙利簽證。許多群人越过国界消失了，另外一些人打算明天才到匈牙利去，于是就开步到周圍准备好了的宿營地去。

現在在广播电台上講話的，是紅衣主教明曾蒂和新任国防部长馬勒特，这个人之所以鼎鼎大名，是因为他曾把基利安兵营交給了暴乱分子。馬勒特剛当了两天的国防部长。他們向暴乱分子呼吁停止战斗——战斗还在繼續进行着。又一次重复播送了匈牙利中立的声明，重复播送了明曾蒂恢复旧經濟秩序的要求。苏軍應該在一个星期內离开匈牙利……它應該在二十四小时內离开匈牙利……它應該举着白旗撤退……它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內不离开匈牙利，就会受到匈牙利空軍的轟炸……匈牙利政府將訴諸联合国……它要求联合国援助……它在不得已时将要求派遣联合国部队……

在这些报导中間，插入了一个消息，說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經解散。这个消息不再使我們愕然了，也不再使我們詫异了。到某时候又广播說，行将成立一个新党即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新党将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像納吉·伊姆雷那樣的嗎？像他那些梦想資產階級民主并宣揚反苏仇恨的朋友們那樣的嗎？

这时候卡达尔、明尼赫和其他共产党人已經退出了政

府，已經宣布他們再也不可能與那些企圖在匈牙利復辟資本主義的人們合作。這時候他們已經在號召匈牙利共產黨人努力使正在建立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成為一個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的黨，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基礎的黨。但這一切在國外還未為人所知道。人們只聽到匈牙利廣播電台的報導和納吉所說的話。

白色恐怖繼續在猖獗。被綁架或是被殺害的人，已經不是個別的，而是成百的了。半夜三更成群結隊的人拿着地址名單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挨家挨戶。他們闖進共產黨人、工會工作者或是被稱為共產黨人的普通非黨工人居住的住宅，開槍把他們全家人打死，讓尸首躺着或是把尸首拖出去，扔在某處地方——扔在石崖上或是小叢林里。有些人被活活綁架了，別人再也看不見他們。

“我看見了人們如何絞死共產黨人，”特派記者們洋洋得意地在資產階級報紙上用大字標題宣告說。在米什科爾茨，受了傷的軍官們被綁在一輛大卡車後面，拖過了全城，直到他們的身體變成了一團模糊的血肉。在吉厄爾一帶，軍官們和黨幹部被吊死在樹上，然後扔到腊伯河中。別的河流里也有尸首。

被關到監獄去的工人、士兵、合作社幹部，為數就更多。“自由戰士”們打算舉行一些審判表演和大批槍決表演。11月3日到4日之間的夜里，在死囚牢房里坐着的，就有好幾百人。例如光是在布達佩斯，就有幾十個在國防部被捕的共產黨員軍官在等待着將於11月4日下午公開執行的死刑。在塞格德，也有三十五個工人幹部定於4日執行槍決，在霍德麥佐瓦爾謝赫利有三十人。

11月2日……,11月3日。’似乎一只鉄手在紧扼住我們的心。在离我們六十、八十公里的地方,我們的同志在死去。曾經把自己一生奉獻給工人階級的幸福和自由的人們的歪歪扭扭、流着血的尸体,現在挂在树上。死亡行軍只不过剛剛开始。那些今天源源不絕地涌入匈牙利的人們,那些箭十字分子,那些霍尔蒂分子、明曾蒂、艾斯特尔哈齐之流,是不会滿足于資產階級民主的——也不会滿足于占据区区一个匈牙利。正如在1919年和1939年一样,他們仍然梦想着一个大匈牙利,他們一看到今天匈牙利的版圖时仍然喊出他們的古老斗争口号:“不,不,永远不!”他們要繼續進軍,正如他們在1939年的進軍一样。在一个軍国主义的西德和一个即将法西斯化的匈牙利之間,現在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奥地利。它能不能长期保持中立,长期保持独立呢?战神正在重新向我們全体伸出他的魔掌。

11月4日,一清早電話鈴就响了。一位同志兴奋过度,用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說:“匈牙利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卡达尔……他們已經請求苏軍援助……苏軍已經出兵了,法西斯分子正在逃跑……国境綫現在被苏軍坦克封鎖了……匈牙利仍然是人民民主国家!”

他挂上了電話。过了好一会我才發覺到,我手里还拿着電話听筒,原来我好多天以来第一次又能够深深而安靜地呼吸了。

不冒烟的烟肉

“你們想到布达佩斯去嗎?”奥地利边境的職員一面問,

一面搖著頭瞧著我的匈牙利簽證。他作了一個臉色，好像是想說：“你們想到莽林去找那些吃人生番去嗎？”他的詫異，對我們這些來自奧地利的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是11月10日的事，是在蘇軍出兵匈牙利之後一個星期，奧地利的報刊正在用大字標題聲嘶力竭地叫嚷：“布達佩斯在火海中！”“蘇維埃用燃燒彈焚燒匈牙利城市！”“全國展開了游擊戰！”“布達佩斯至今已有七萬人死亡！”“革命又採取了攻勢”，以及諸如此類。廣播電台的說法也一模一樣。

因此，甚至好心好意的人，也很難判定在匈牙利究竟發生著什麼事情。加以電報電話仍然未通，郵政聯繫仍像從前一樣中斷，火車又不开，所以要判明情況就更加困難。甚至在發簽證的公使館里，人們也是聳聳肩頭，說他們不知道我們能否一直到達布達佩斯，戰鬥是否已經結束，因為連公使館自己也沒有什麼聯繫了。

關於匈牙利的唯一消息來源，就是布達佩斯廣播電台；但連布達佩斯廣播電台也沒有提供出明確的情況。它發表一些關於保證某一城市的食品供應、關於對某一地區的搶劫犯實行制裁的消息，偶爾也發表一個號召某一部分工人復工的宣言，有時候發表“目前已在布達佩斯出版的‘人民自由報’”的簡短摘要（從這裡我們知道了在布達佩斯至少重新出了一份報紙，大概這就是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報紙了）——此外就全是播送音樂、音樂、又是音樂。在這些日子裡，甚至最熱心的匈牙利民間音樂愛好者，當他一次又一次地聽到播送一首民歌的時候，也會氣得把收音機摔得粉碎。我們坐在收音機前面，神經緊張，心頭卜通卜通地跳著。我們期待能聽到在匈牙利發生了什麼事，全世界的人們的目光，都正在帶著仇恨、憤怒或是提心吊膽的關注心情

投向匈牙利——但我們所听到的，却是一个少女在月光下徘徊，在水泉旁边等待着自己最亲爱的人！（关于这些蹊蹺的广播节目，我們直到在布达佩斯跟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負責干部談了几次，才揭开了謎底。广播电台的人員实行了抗議罢工，来“抗議”卡达尔政府的成立和它向苏軍要求协助击败反革命的行为。經過長時間談判之后，他們終于表示願意播送一些消息和报上最重要的文章的摘要。但他們声明說，不能在电台上进行政治宣傳。他們所指的“政治宣傳”，是指政府的決議，首先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決議。在我們到匈牙利来的那一天，政府在与电台人員进行的辯論中得到了一个进展；它使得电台播送了卡达尔总理的一篇演說詞。經過了好几个星期的長時間而耐心的辯論，电台人員才放弃了他們的反抗，听从政府支配。）

那么，在匈牙利發生着什么事呢？發生了一些变化，这一点可以从赫杰什哈洛姆边防办公楼的一段小插曲中看到。海关大厦的过道和前厅，污水遍地，两个妇女和一些士兵一起，卷起了袖子，咬牙切齿地打扫着地面。她們一看见我們就馬上开口說，經過了那帮箭十字分子的占据之后，現在該把这地方整理一下了！他們把边防办公楼糟塌成这个样子，这是匈牙利的一个耻辱。經過是这样的：当苏軍11月4日在匈牙利开始对反革命分子首先是对渗入的箭十字匪帮作战的时候，有一队箭十字分子逃到边防办公楼来，揚言要守住这处穿过国境綫的过道——必要时不惜死守。苏軍部队不願在离奥地利国界沒多少公尺的地方作战，于是初时就讓“自由战士”們在边境上自由自在。他們每天越境到奥地利去，从那边取得食物，然后回来，并夸下海口說，卡达尔政府要接管这边防办公楼，除非跨过他們的尸首。他們

至少有一百次被拍了照，供西方报纸特别是美国报纸登载，当作是“英勇的匈牙利反抗运动”的证据，而且从11月6日或7日起，外国摄影记者们还在一处约离十公尺的沟坑里设立一个常驻地，打算把这批边防勇士的壮烈牺牲情景保存下来，供现世和后世景仰。11月9日，苏联坦克士兵们大概是忍无可忍了；一辆坦克开动起来，向边防办公楼冲过来。但是，所谓壮烈牺牲，却落了空。当坦克还在约三十公尺远的时候，“自由战士”们和摄影记者们就狼奔鼠窜了。他们一口气不停地以创造新记录的速度跑过了无人地带，虽然苏联坦克早已停住，他们还在跑，直到跑过了界栅，到了尼克尔斯多夫，他们才停下来不跑了。这是伟大的匈牙利悲剧中这一幕的一段怪诞的小小终曲。

“他们滚了之后，剩下的边防办公楼成了个什么样子！”一个打扫地面的妇女气愤地说。“他们像猪猡一样糟塌这地方！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地方整顿好。我们在客人面前真是丢脸啊！”

这样，赫杰什哈洛姆边防办公楼里的妇女和士兵，大概没有经过高深的政治分析，就已经相当清楚地看透了那些“自由战士”，理解到了有民族自觉的匈牙利人所应完成的任务——在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插曲之后，重新把自己的家整理好。这是不是匈牙利普遍的看法、普遍的心情的一个象征呢？在赫杰什哈洛姆的边防办公楼，我们曾经这样期待过。但是可惜情况并不如此。一些平凡的人们从一座小小的边防办公楼及其遭遇中看清楚了的道理，在这些日子里，却在全国范围和国家大政的范围内长时间为人们所不理解。

但是，一切仍然似乎很井井有条。边境后面的田野像

从前一样安詳地伸展在秋天的陽光下。处处都像从前一样在耕作，在收割最后一批甜菜，在收拾玉蜀黍杆。羊像从前一样在草地上吃草，鵝和从前一样在水池上閑游。“全国在战争嗎？”——看不见一点儿痕迹。在我們沿途經過的村子里，沒有一幢损坏了的房子，沒有一面打破了的窗戶。只是人們仍然閑着站在街上。在吉厄尔也是一样。关于这个城市，这个被預定为那功亏一篑的独立西匈牙利共和国中心的城市，报上报导說，它已經被苏联炮兵和苏联空軍夷为平地了。实际上在吉厄尔也是沒有一幢损坏了的房子，沒有一面打破了的玻璃窗——甚至連大百貨公司的巨型大鏡也沒有损伤。报纸又大声疾呼說：“匈牙利快要餓死了！”但是在吉厄尔市中心的一家旅館的菜单上，有八样葷菜、三种湯、五种甜品，服务員还保証說，每种菜都可以随时供应。

那么，一切都井井有条了嗎？在吉厄尔的市廣場上，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情形并不是如此。那里和所有各处一样，站着一大群人——好像十天、十二天、十四天以前一样站着。是傍晚时分，沿着中心大馬路，挨着廣場旁边，一队苏联坦克和苏联士兵駛过，方向是朝着边境，大概是去接替駐在更前面的部队。三輛大坦克經過了，后面跟着是两輛載着苏联士兵的大卡車，接着又是三輛坦克，又是两輛大卡車，最后又是两輛坦克。当最初两輛載着士兵的大卡車經過了之后，忽然有人在廣場上喊叫起来：“瞧呀，他們綁走了我們的人！瞧呀，他們在放逐匈牙利人！”

叫喊的人，不是个醉汉，就一定是一个瘋子，因为全廣場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该看得清楚——，坐在大卡車上的，只是穿着一望而知的苏軍制服的苏联士兵，連匈牙利士兵也沒有。即使不是如此，苏軍何必偏偏把匈牙

利人“放逐”到西方，到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地方去呢？但是，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叫喊起来，整个广场在叫嚷，在埋怨，在咒骂：“他们放逐匈牙利人。”

我的女伴说得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她生气地抓住一个站在她旁边的人的胳膊，高声向他喊道：“你们疯了，瞧瞧吧，看一看，卡车上只有苏联士兵呀！”这个人无动于衷地瞧瞧她，然后又像留声机一样背诵说：“他们放逐匈牙利人。”

消息满天飞——甚至在还没有电话和电报的地方也是如此。两天之后，我们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墙上看到了一个“青年革命委员会”的招贴，里面说，吉厄尔有好几百匈牙利学生被“俄国人”放逐了，招贴要求居民继续进行罢工，直到“被放逐者”获释为止。二十四小时之前，在“吉厄尔放逐事件”之后还不到一天，“匈牙利拉柯齐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分台之一，它当然不设在匈牙利——向匈牙利播送了这个故事，里面的血腥细节描写得有声有色。

这是不是唯一的一个说明匈牙利的情况还远未上轨道，争取在匈牙利恢复正常关系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开始的象征呢？不，还有别的更加严重得多的象征。从边境到布达佩斯，沿途有许多工厂。每当远远浮现出一个烟囱的时候，我们就满怀期待、满怀希望引领眺望它：它上面会不会升起一股烟，说明工厂在开工呢？有没有一股烟来说明罢工已经停止，正常生活已经重新开始呢？但是烟囱里没有烟升起来。工厂大门紧紧关着；在门口往往可以见到一些拿着手提机关枪的人。我们已经在广播里听说过为了保护企业而成立了“工人武装队”。这就是“工人武装队”吗？他们保护企业吗？但是他们保护企业防范谁的侵犯呢？

我们好几次经过一些货运车站，跨过铁轨。车站里毫

無動靜，一個車廂也沒有調動，一列車也沒有開來過或是開走過。但是到處都排着長列的貨車廂，一動不動，有的空着，有的已經載了貨物。忽然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些車廂。在30日，它們載着農業機器，停在迴車軌道上。今天，10日，它們還是停在那里，還是載着那一批農業機器。

礦業城市多羅格，位於匈牙利一個大煤礦的附近。礦場地面上看不見人，吊車一動不動地掛在繩索上。但是這里的人也是站在街上，等待着——像他們兩個星期前那樣等待着，像現在吉厄爾和沿途其他地方的人們那樣等待着。離開多羅格之後二十公里。一隊巡邏兵攔住了我們。使我們最吃驚的，是這些人仍然像從前一樣佩帶着納吉時期革命委員會“自由戰士”們的徽號和臂帶。經過我們詫异地發問後，他們証實說，這處地方仍然像從前一樣由“革命者”占據着。前面十公里和後面十五公里的地方，都有蘇軍坦克封鎖着。這塊地方怎的又會“由革命者占據着”呢？他們是否作過戰，守住了這塊地方呢？他們對我們的這個問題，有點困窘地回答一個不字。這僅僅是因為這里沒有誰來同他們爭奪對這一塊地方的控制权罷了。如果有人來呢？“那麼我們就打！”“打多久呀？你們哪里支持得住呀！”“一直打到聯合國來幫助我們為止。”“聯合國不會來的，你們盡可以相信這一點。”回答是聳聳肩。（十天之後，這塊地方不再由他們占據了，他們也沒有打。新成立的匈牙利政府的一支當時只有兩團人的隊伍，輕而易舉地接管了這塊地方。但是，在“起義者”向我們保證他們一直打到聯合國到來為止的那一天，匈牙利政府連這兩個團還沒有。這兩個團不得不從頭建立起來。）

布達佩斯。破壞比10月30日稍為厲害了些；受損壞

的房屋多了，打破的窗多了，拖在馬路上的電車架空綫也多了。城郊的战斗破坏不太明显，真正破坏得厉害的，是曾經是战斗中心的第八和第九区。那里有一些馬路，例如列宁大街，成了一堆瓦砾，整幢的楼房被摧毁了，整幢的房屋被夷平了。当然，早在11月4日之前，这里也就已經受到了不是由于輕武器、而是由于炮兵而造成的严重破坏——暴乱分子早从30日开始，就出动了炮兵。

馬路挤滿了人，多瑙河的桥上挤滿了人；電車不开，公共汽車不开，人人都徒步走路。所有的工厂都停着，至少所有大工厂是如此；一些小工厂，首先是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工厂，是在工作的。

既然不开工，既然桥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并不是川流不息地下班或是上班，那么，这些人是往哪里去的呢？首先看出，这些人是去买东西的。在布达佩斯疮痍滿目的馬路上买东西嗎？是的，这些人归根到底还是要生活。他們归根到底还是需要面包，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牛奶和乳酪、蔬菜、馬鈴薯，甚至肉类。

但是可以看出一点令人詫异的事情，而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这一点还会日益显著。街上排着长队，但并不是在食品店前面。食品店里面也是挤滿人的——这些商店營業時間每天只有四五个鐘头——，但是并不人滿为患。在卖肉和卖面包的地方很挤。但是在那些櫥窗里——只要有櫥窗的話——陈列着蔬菜、苹果、馬鈴薯的店里，却只有四五个顧客，不用等候。相反地，在那些窗門被打掉，但是——走近前去时可以看到——里面售卖紡織品的商店，却站着长列的人群。

一个女人从里面出来，她的購物手提袋里放着三双袜

子。一个男人跟在她后面。他吃力地用肩头扛着一大卷窗帷料子，大約有二十公尺。在所有工厂停了工的布达佩斯还买窗帷料子，在一个经历了这样的几个星期的城市里还买窗帷料子？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个男人竟好像回答世界上最简单明了的问题一样回答说：“是的，我们早就需要新的窗帷了。誰知道福林还能值錢多久呀——何况我现在又有空上街买东西。”

“有空？什么有空？”

他对提出这样一个古怪问题的人诧异地瞟了一眼：“当然啦，因为我们在罢工。我们有空了。只要每星期到企业去一次就行了。每星期五。”

“既然你们在罢工，那又为什么到企业去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一星期只一次。星期五。这是发工资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大概没有正确理解他的话。“你们不是在罢工吗？你们每星期五还拿工资？这是说，罢工的人还拿钱吗？”

“当然啦，”这个人说，然后把那一卷沉重的窗帷料子换了一个肩头上，走开了。

我们在这一天还另外问过几十个人，他们也全是在罢工。他们全都向我们证实说，他们都领到工资或是薪金，在某些场合，他们除了工资之外，还领到罢工津贴。问到第十个或是第十二个人的时候，我的那个同伴再也忍不住了。当我们遇见的那个人告诉她，“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再罢工几个月的工”的时候，她动起怒来了。“真是耍把戏，”她说，“罢工，还要领工资。你们对罢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设想过呢？你们知道在奥地利工人如果罢工就要挨饿吗？你们

知道他們的家庭要吃多大的苦嗎？你們聽說過二十年代英國礦工的大罷工嗎？那一次，罷了四個月的工作後，女人到村子附近的山坡上拔草來給家里煮湯喝，因為他們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吃了。這就是罷工，這就是真正英勇的罷工！但是你們的罷工呢……！”

“罷工不領工資么？罷工要挨餓么……？”這個人詫異地瞧着我們。接着他似乎心血來潮地想出了一個理由。“您看，這是兩回事呀，”他耐心地解釋說。“那是在資本主義下的罷工呀。但是我們这里是社會主義。當然就有所不同。”

用這種方式向我們說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的那個人，覺得對社會主義的國家進行罷工也并無不可。這是當時匈牙利無窮無盡的混亂的一個標志——這種混亂在全體居民當中是如此，在工人階級當中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把罷工和匈牙利當時的整個局勢都歸因於這種混亂，那當然是完全錯誤的。事情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現實得多的原因。混亂只是妨礙了人們去認識真正的原因並對之採取對策。這次直到好幾個星期後才慢慢逐步地結束的罷工，其原因何在呢？我們在这里介紹一下一個匈牙利工人的談話，這一席話指出了真正的情況。

這個工人站在自己房子前面的路邊，把打破了或是射碎了的窗玻璃碎片掃集起來。碎片非常多，而且往往小得很，但他細心地掃，有条不紊，好像他是在把一件複雜而重要的機器的零件拼湊起來似的。我們問他為什麼在這些小小的碎片上面下這樣大的工夫，他回答說：“我們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們不能整天老是閑站着，抬頭看天呀。我清早走兩個鐘頭的路到工廠去。然後我在那里站半個鐘頭，設法進里面去。然後他們又把我趕跑，我再走兩個鐘頭的路回

家。但这一共只有四个半鐘头，最多也不过五个鐘头。剩下的時間我怎样消磨呢？扫扫地也总比閑着沒事強些。——玻璃碎片反正早晚是要扫除掉的。”

这个人在一家大企業工作。他每天都設法想进入企業里去开始工作。但是要进入企業去是不可能的，因为門口站着一队配备了手提机关槍的警衛，威胁要开槍射击每一个打算进入企業去的人。有些工人不顧这一点，企圖越过警衛进去，被开槍打伤了。“我們本来就很客气的，”警衛吹噓說。“我們只开槍对准你們这批破坏罢工的下流坏子的脚上射击。下一次我們就要射高一些，到时候你們就連医院也不用进了。”

这些說人家是什么“破坏罢工者”同时又向工人开槍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他們自己是工人嗎？

在这个企業里，跟在别的企業里一样，参加“工人武装队”——这是那个用手提机关槍强迫工人罢工的集团的自称——的，也有几个本企業的职工。他們大多数从前并不是工人，而是手工業者、从前霍尔蒂統治下的高級职员、从前的軍官，他們后来进了这个企業工作。但是工人武装队的大多数成員却是企業外面的人。“工人武装队”是几乎在所有各处以同样的方式出現的。23日之后几天，企業里有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然后通常都是把这个委员会当作一个現成的机构介紹給当时还在企業里的工人。工人委员会里有正直的工人——但也有在强迫下“选举”出来的前箭十字分子和霍尔蒂軍官。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员和其他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是不在工人委员会里的，因为他們在这些日子里正在別处战斗，或者沒有被允許进入企業。一两天后，几乎所有各处都出現一股武装分子，他們声称是

“地方革命委员会”派来的，其任务是保卫企业。这一股人，几乎总是由从前的箭十字分子而且往往干脆是由犯罪分子所组成的。工人委员会里有些人马上同意了这股人进驻，另外有一些人，那些正直的人，对这些“保卫者”本来是感到不对头的，但是或则不敢表示异议，或则认为本企业在动荡时期的确需要一支警卫队——这种武装警卫队是他们当时所没有的，因为纳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匆匆忙忙地把那些有武装的企业解除了武装。于是这些正直的人也表示同意。“工人武装队”开始工作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开头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企业的金库里支取出他们工作的酬金——在许多企业里，“工人武装队”的队员们每人得到五千福林（约合一千马克）。在企业金库现款不够的地方，例如在大规模的奥利翁无线电厂，“工人武装队”就借口“偿付支出”，把库存货物劫掠一空，暗中卖掉。

纳吉政府消失了，卡达尔政府来了并且号召复工。但是“工人武装队”在那儿，他们规定了自己的任务就是阻挠复工。每天重复向他们提出这项任务的，是“自由欧洲”电台，是它那些伪装成秘密电台的分台，还有就是维也纳电台，这些电台天天号召对“破坏罢工的工贼”进行斗争。而“工人武装队”则忠实地执行交付给他们的任务。这些“工人武装队”对人们的生命、对工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乎。所以恰恰在11月10日这一天，那些企图恢复公共汽车交通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和司机们，把车一开出车库，就遭到了枪击。一个售票员和一个司机被打死了，另外好些人受了重伤。于是恢复交通的企图就只好又一次作罢。

“工人武装队”和其他这一类的武装集团的这种行为，在这些日子里并不是一种例外，而是家常便饭。但是，工人

終归仍屬多數。为什么他們竟被这一些武装分子集团吓倒了呢？

敌人、騙子、眼前風头人物

为什么工人被吓倒了呢，为什么例如一个中心鐵路車厂的一千二百名职工在这些日子里竟然被不到二百名的武装分子赶跑了呢？首先是因为在11月最初两三个星期里，恐怖的气氛根本还没有消失。白天布达佩斯比較安宁，在馬路上和廣場上甚至可以看見小孩在玩耍，他們在战斗的日子里几乎一整个星期和他們的母亲一起坐在地下室里，現在终于能够重新出来在空气和陽光当中玩耍了。但是夜里，一下子在这个区、一下子在那个区仍然进行着射击。上千上万的槍枝落到了反革命分子手中。好些人漸漸遵从了政府的号召，繳出了武器，不如說，扔掉了武器。新成立的警察部队天天都在沟坑和城郊的崖谷里收集遺弃的武器。甚至在离岸不远的多瑙河水里，每天早上都有步槍和机关槍放在那里。

但是，那些繳出了武器的，大都是同路人。真正的积极的反革命分子、从前的箭十字分子、从国外派到匈牙利来的或是在匈牙利經过了十二年之后重新活躍起来的法西斯分子，根本就不考虑把自己的武器交出或是扔掉。第一，他們知道，这一次是他們最后的机会，匈牙利如果这一次制止了反革命，就永远不再会屬於他們所有了，第二，外国的施主們一天又一天地敦促他們干到底。因为外国电台和伪装为自由电台的外国广播站所抱的目的，不光是在居民当中引起混乱和恐慌，而且首先是要向反革命力量給予指示，对他

們說：“干下去”。例如，如果“自由歐洲”电台报导說某一企業里“破坏罢工的工賊”已經被赶跑，那这就是对該企業的“工人武装队”的一个要比以前干得更凶的指示，是一个要动員全力来維持总罢工的指示。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悲剧，在于低估了它的敌人的数目和他們良好的、完善的組織。今天事后回顧一下，就显得几乎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竟能低估了敌人的人数。从1919年到1945年，在这二十六年間，匈牙利曾經是一个法西斯国家。霍尔蒂和他的党羽設立了自己的国家机构、自己的官吏、自己的士兵、自己的警察、自己的法官和行政官，他們創立了用法西斯精神来影响人民的机构——自己的教师和記者、自己的傳教士和作家。最后，法西斯主义还創辦了自己的群众性組織箭十字团，并在軍隊中培养了一批对法西斯主义忠心的干部。

所有这些人，当然并没有消失得無影無踪。假如匈牙利像别的被法西斯主义統治的国家那样有过一个长期、艰苦、牺牲重大的爭取解放的斗争，有过一个不是由一小群英勇不怕牺牲的人所进行的而是由广大居民阶層所进行的斗争，那么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自己就已經会清算掉法西斯主义者，粉碎他們的队伍，并且明确了解到这些人是敌人。可是，匈牙利虽然也有过抵抗运动，但这运动規模很小。要不是有苏軍的帮助，匈牙利要从法西斯主义統治下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

这个帮助是一件偉大而光榮的贈礼。但是贈礼永远比不上斗争有說服力。切身的生活和切身的經驗，的确是一个更偉大的教师。

1945年，数以千計的法西斯分子离开了这个国家。他

們逃到西德和奧地利美占区的美国难民营去。他們在那兒被糾集起来受訓——以备用之于“一朝”。另外一些留在國內，有些作为战争罪犯被审判，許多被判处长期徒刑。大多数仍然与人民民主匈牙利为敌。在納吉政府的日子裡，在“仁慈”和“人道”的外衣下，开放了这些人所坐的监牢。由于“人道”而被釋放的法西斯分子，馬上着手糾合起来并在軍事上組織起来，以圖复辟自己的統治。

第三类，人数最多的，是箭十字分子和其他或則經過短期徒刑重新获釋或則根本沒有被关过的法西斯分子。这些人获准参加生产，以工人的身份謀生。匈牙利工人有一个天真的信念，以为在工厂里一两年老老实实的劳动，就足以自然而然地化敌为友。但在1956年10月可以看出，这是根本不够的。

后来，在好些大企業里，工人們告訴我們說，大約在一年之前，忽然有大批从前的箭十字分子和霍尔蒂分子到工厂来报名要求工作。以前他們大多数曾經拒絕到企業去，而靠走私或是类似的事業过生活。許多工人对于这些人开始覺悟和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員的这一征象感到十分高兴。直到后来，在10月23日之后，他們对这种开始的覺悟为什么来得这样突然而且这样有組織，才恍然大悟。也就是說，直到那些“新工人”忽然間在許多工人委員會里夺取了領導位置，企圖把工人委員會变成为一件工具来把一切真正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排挤出企業的时候，他們才恍然大悟。

箭十字分子在企業里是組織得这样严密，在别的方面的公共生活中也是如此。在10月23日之后的日子裡，在記者协会和作家协会里，忽然成批出現了本来沒有被允許重

操旧業的前霍尔蒂報紙的編輯和撰稿人，他們“以民主的名義”宣布自己有权在經歷了十二年的“職業放逐”之后，現在再来重操旧業。在这些日子里，并没有人能对“民主”这个論点提出異議，記者們和作家們自己过去几个月来也大声疾呼要求过“民主”，并对那种認為給人民的民主和給人民敌人的民主是两回事的說法当作是“斯大林主义”而憤然加以否定。霍尔蒂記者們馬上靠着一些公然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提机关槍，接收了各組織的領導权，并开始在他們的朋友当中拼湊出未来匈牙利新聞界的編輯总部。甚至在11月4日之后，他們仍然留在作家和記者的組織里，因为甚至在11月4日之后，其他的作家和記者仍然認為清除这些人是与民主的原則不相容的。这些人虽然躲在幕后，但是影响着別的人，因此，作家协会甚至当反革命在軍事上已經失敗之后，实际上还是执行了反革命的政策。

国防部發生的情况也差不多。在那里，10月28日出現了几百名制服整齐的霍尔蒂軍官，他們宣称他們是来“以民主的名義”恢复他們过去的职位和权力的，于是他們实际上接管了整个部。他們在这方面受到不久之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馬勒特以及納吉的某些朋友的支持。这样，国防部就变成了反革命的一个强固陣地。

在其他各部以及無数机关，也發生了同样的事情。“前人”們出現了（他們也許本來就已經在这些机关和部里担任下級职位），并且又是以民主的名義接管了領導职位。在有些部里，他們搞“清洗”搞得这样急，以致他們甚至在不問政治的人們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們不但把共产党人全都馬上赶走，而且还把一切工人子弟或者本身曾当过工人的人們全都無限期免职，理由是不能用“这样的人”，因为

他們沒有能力担負这样負責的工作。有資格并有能力做这种工作的，只有內行人，因為他們“世世代代都受過進行这种活動的訓練”。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這表明了匈牙利的反革命是組織得十分嚴密的，在行動當中是有計劃性、有軍事上的準確性的。它之能組織得這樣好，這是不足為怪的。匈牙利是反革命打進去活動得最厲害最有系統的国家。好多年來，從薩爾茲堡和西德的美國收容營向各處熙來攘往地派出了特務、教官、組織者。好多年來一直以收容“難民”為借口，經過奧地利邊境接出了許多人，加以訓練，並重新派回匈牙利去。好多年來“自由歐洲”電台一直向匈牙利居民灌輸影響。10月28日以前至少十個月期間，美國的宣傳氣球向匈牙利投擲了炮火一般密集的傳單。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唯一等待着的只是一個有利時機；當人民民主政權的錯誤和弱點提供了這個有利時機的時候，他們就動手了。但是，甚至在11月4日之後，危險也在于一大部分反革命組織仍然像從前一樣在國內存在，並且仍然像從前一樣繼續活動。

此外，人們也低估了美國對匈牙利的廣播宣傳所起的作用。“自由歐洲”和其他廣播站的廣播，過去和現在都是撒謊，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談很多，但是，對於許多不問政治的人來說，從收音機里發出來的聲音，就是權威的聲音，他們對於這個聲音所說的話，至少相信一部分。我們在夏天曾經親身經歷過一個小小的事例——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加以足夠的注意。當時有許多奧地利人到匈牙利探親度假。在許多情況下，都發生了一件幾乎相同的事情。當我們的休假者下火車的時候，他們的親戚就在車站半責備半开玩笑地歡迎他們說：“噢，你本來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小汽

車來呀，我們本來就知道你有輛小汽車，你用不着客氣呀。”當客人詫异地問他們為什麼說出這樣怪誕的話來時，這些親戚就說，他們在“自由歐洲”廣播中聽到過，在奧地利，一輛新汽車值五千先令，一個工人每月掙三千先令，每個工人經過六個月到九個月，就可以自己買一輛新汽車。我們的度假者解釋說，在奧地利，一個工人掙的不是三千先令，而是最多不過這個數目的一半，一輛小汽車不是值五千先令，而是這個數目的六倍到七倍，雖然一些工人和匈牙利的工人一樣有機噐腳踏車，但是只有極少人有小汽車，他們聽了這些話很久都不相信。理由是：“一個廣播電台不會撒這樣大的謊吧！”

在這些日子裡，我們也在布達佩斯看到了說明反動廣播產生了多大影響的一個典型事例。我們在街上又被一些陌生人攔住問道，如果他們到奧地利去的話，能在什麼地方領取他們的一萬美元。我們反問他們怎會這樣荒誕無稽。他們告訴我們說，“自由歐洲”電台曾經宣布，凡是作為難民逃到奧地利去的匈牙利人，每人都可以領到一萬美元作為安家立業之用。“自由歐洲”電台的確說過這些話，不過它說的數目是一千美元。一傳十，十傳百，數目就增加到十倍了。但是人們堅定地相信他們一離開匈牙利就可以拿到錢，我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能夠打消他們這種想法。

工人們為什麼被吓倒的一個原因，是敵人為數的確很多，而且這些敵人十分活躍。第二個原因是普遍的混亂。在這些日子裡和在這些日子之後，人們在匈牙利常常談論兩類通過其影響而大大助長了混亂的人——Hendlfänger（騙子）和“眼前風頭人物”。

“Hendlfänger”在匈牙利文的意思是騙子、拆白、蠱惑家。這些“騙子”一部分本身就是有意識的反革命分子，一部分是由于在這個普遍混亂中有謀得聲名和威望的機會因而沖昏了頭腦的普通人。反革命的“騙子”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杜達什，這個人參加了占據基利安兵營的行動，後來“接管”了外交部。杜達什10月24日與25日開始活動時的第一個傑作，就是伙同他的黨羽襲擊了一家銀行，在那里弄到了二百萬福林，把這筆錢向街上的行人散發，並說：“人民民主政權讓你們挨餓，但是你們的父親杜達什卻關心你們。”

在后來的幾天，分發繼續進行，這一次，杜達什和他的朋友們劫掠了一些大規模的紡織品商店和倉庫，向居民分發衣物和鞋子。不過這一次還有一件“附加物”——凡是領到一件大衣或是一雙鞋子的人，都必須同時領五枚手榴彈。

但是，杜達什是“騙子”的極端例子，這種人是比較易于揭露的，因為甚至在這些混亂日子裡迷失了方向的那些人，也想到了，散發千百萬的巨款和分發價格很高的大批衣物與鞋子，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忍受得了的經濟原則。更加危險的，是那些無意識的“騙子”。他們是一些把每一個要求都加以抬高從而企圖嘩眾取寵的人。例如還是在10月底的時候，在塔塔班雅煤礦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把工作時間減少為六小時。于是就有一些“騙子”——他們大多數不是工人，而是技術人員和職員——跳了起來，宣布說：“工作時間縮短到六小時還不夠，我們還要求工資提高百分之五十。”接着又有一個“騙子”叫囂說：“百分之五十太少了，我建議增加百分之七十！”

工人們對這種誘人的建議如果不說“贊成”，那他們就

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了。于是，“騙子”們就被选入了工人委员会里，他們还有不少人从工人委员会进入了各个区域工人委员会或是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武装的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騙子”們仍然留下来。他們当中有许多人的确不是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些沒有任何責任感的糊塗蛋。但是，那些在他們帮助下提出来的要求，也仍然留了下来，其中大多数要求，是在匈牙利經濟情况的基础上所無法滿足的。但是，当卡达尔新政府把这一点告訴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們的时候，这个政府却遭遇到最尖銳的反对和更深刻的不信任。

最后，还有一批害群之馬，他們在这些日子里和在后来很久都一直妨碍着消除混乱的斗争，并使任何正常化成为不可能，这些害群之馬就是那些所謂“眼前風头人物”。这个名称是匈牙利工人創造出来的，是指那些只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思想、生活与作判断并对后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人。“眼前風头人物”这个名詞早在11月中旬就在各企業里流行起来，这一点就說明了工人是不喜欢这件事的，但是他們当时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眼前風头人物”的影响。

这些人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匈牙利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和其他一些这类組織的領導成員。这些人早在10月23日之前就带来了很大的損害，他們在他們的組織中把党内問題搬到党外去討論，在裴多菲俱乐部和作家协会中形成了一条各种政治方向的知識分子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統一战綫，并且早在10月23日前几个星期就与暴乱分子的有組織的軍事集团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工人們当时所不知道的，是那些所謂眼前風头人物的行为，根本不是因为受到一时心血来潮的影响。首先，裴多

菲俱乐部和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作家协会，其领导人员已经为反革命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例如，他们在反对党的斗争中，已经与从前霍尔蒂时代的法西斯知识分子领袖们，与一些公然要求取消人民民主制度并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最密切的合作，别人劝告过他们叫他们至少要与这些同盟者划清界线，而他们却对每一个这样的劝告都回答说：“在反拉科西的斗争中，我们找任何人做同盟者都是对的。”正如后来才暴露的，他们不但与后来以“起义者”名义出现的反革命分子集团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外国朋友，西方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不过，虽然“眼前风头人物”的性质后来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这个名词还是沿用下来。

这些人物在十月事件期间和以后的所作所为，更加来得不負責任。

至少大概从10月30日起，那些谈了这么多人道精神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就已经确实地知道了白色恐怖的浪潮有吞没整个匈牙利的威胁，但是他们拒绝对此表示态度。作家领袖之一哈伊·尤利乌斯早在30日就知道了市委大楼屠杀案的消息。他表示感到震惊，但他拒绝对广播电台去并对白色恐怖表示反对。我11月10日到达布达佩斯的时候，曾请一位匈牙利朋友打电话去找哈伊，请他发表一篇谈话。哈伊在电话里的答复，是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他说他原来不知道反革命做了些什么事，他本是不希望如此的。那位匈牙利朋友向哈伊建议，说他至少应该现在到广播电台去讲话，说明他和他的朋友们原来并没有打算帮助反革命，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遗憾，这样他就可以对局势的正常化和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表示自己的支持。但是哈

伊断然拒絕了这个建議。他說他的神經受到了刺激，現在不能講話。

哈伊和其他有名望的作家們在 23 日后曾贊揚了“光荣的革命”，并把它当作民族起义和匈牙利人民的解放来歌頌，这一事实，大大有助于欺騙一些信任大作家的普通人，使他們看不清匈牙利反革命的性質，从而便利了对他們实行煽动。在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斗争中，無数普通的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作家們的神經却是这样脆弱，連發表一篇广播演說来帮助打击这个反革命也办不到，而这个反革命的性質，他們据說是已經認識了的。

这一班人根本就沒有有什么骨气。約在 11 月中旬，我訪問了匈牙利大作家伊列什·貝拉。伊列什是沒有参加作家协会和裴多菲俱乐部成員們的活动，而是对这种活动加以尖銳譴責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个。因此，作家协会和裴多菲俱乐部的人們在 23 日后曾要求把他当作“斯大林主义者”和“拉科西代理人”而加以逮捕，甚至还要求审判他。11 月 4 日苏軍出兵。11 月 6 日，那些沒有由于神經受刺激而坐在家里的作家协会领导人，就来到他們几天之前还要求加以逮捕的“拉科西代理人”伊列什家里找他，低声下气地恳求他出面去向“俄国人”交涉，不要讓作家們遇到什么事。伊列什·貝拉当时臥病在床，而且他对真会有人企圖侵犯作家这一点感到怀疑。不过他还是起了床，在狂風大雪中步行了两个鐘头（这一天天气忽然变冷了），到苏軍中央司令部去，要求不要讓作家受到迫害。他从总司令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对他怎会异想天开地以为人家会侵犯“这些傻瓜”表示詫异，于是他再步行两个鐘头回家，去安慰作家們一下。

我訪問他的那一天，作家协会那些担任領導职务的代表們又來了，他們又要求他再一次出面交涉，這一次是向政府交涉，因為有一個危險存在，就是：由於文化預算即將縮減，作家們的收入在將來將會比以前差得多。（對於這件事，作家协会剛剛決定實行創作總罷工來對卡達爾政府表示抗議，雖然這件事在這些日子裡對公眾的影響不大。）當伊列什在側廳和我正在談話的時候，那些剛剛請求過他出面交涉的先生們，就在我的女伴——一位奧地利同業——面前大肆詆毀他，並對一份奧地利報紙竟然認為有必要報導一個像伊列什·貝拉這樣“無關重要”的人物的情況，表示生氣。就在這段時間，伊列什在側廳嘆著氣說：“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必須努力儘可能說服他們，不是我們共產黨人，又是誰來使他們恢復理智呢？”

假如這些人只限於進行創作罷工和陰謀反對別人，那還是可以勉強容忍的。但是，在這些日子裡，他們自己抱定了一個遠大得多的任務。他們從一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要求工人們“無論如何”都要繼續罷工下去。他們寫傳單（傳單由非法的暴亂分子集團散發），在傳單里也要求實行總罷工，並且在另外一些傳單與招貼中宣布每一個匈牙利人的義務是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寧可英勇成仁，也不忍辱偷生。誰也不知道他們在這裡想像一些什麼，但是裴多菲俱樂部成員們烈火般的決死信條，在這些激動而混亂的日子裡，特別對青年人給了一定的影響。

但是，在激動逐漸為清醒所代替之後，這批人在各企業里就更加吃不開了。在布達佩斯最大的冶金企業馬瓦格廠，他們甚至不自覺地促成了罷工的結束。當工人委員會正在談論是否應該停止罷工的時候，來了一個作家协会代

表团，要求工人“繼續罢工，直到最后一个俄国人和最后一个共产党人滾出匈牙利为止，那怕需要罢半年工也不要紧。”一个工人委员会委員——他还是一位右傾的——沉思地回答他們說：“你們作家講得可容易。你們出一本書，就拿三四万福林，此外你們光光因为是作家，就还拿到月薪，你們当然半年不工作也很容易过。但是我們工人不会一直繼續拿到工資的——到时候，如果我們罢工，我們靠什么生活呢？”于是代表团就生起气来，向工人們宣布說，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接受知識分子的領導，因为在現在这个原子时代，生产力的主人不再是工人，而是工程师亦即知識分子了，人民的真正領導者因此也不再是工人，而是知識分子。但是工人們不必担心，作家們不会忘記他們的，作家們会代表他們的利益。这一来，以右傾分子为首的工人委员会委員們也气得七窍生烟，他們不客气地罵作家們是“飯桶”，向他們宣告，工人自己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許还能像往常一样同时也代表了知識分子的利益；委員們把代表团赶了出去，然后决定复工。

如果我們在10月23日的日子里还可以相信，作家們并非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而只不过是当了普遍混乱的牺牲者，那么，后来就可以看出，这种說法，對他們当中的許多人是不适用的。他們已經成了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公开的敌人。直到12月和1月，几乎沒有一个前“自由战士”反对政府的行动是作家所沒有参加的。“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西方广播站一号召举行罢工或示威来反对政府，作家們就馬上起来編写通牒与宣言，号召举行罢工或示威。在10月和11月，許多人还宣称他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对“专橫行为”而已。不久，他們連这一点也不再談了。他們

最出名的發言人之一，記者基梅什，在一次作家集會上在掌聲雷動中宣稱，馬克思主義，整個科學社會主義，已經“過時”了，現在只有一條路——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他並且要求聯合國部隊開進匈牙利。這個要求並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反駁，有些到會者只不過認為目前時機還是過早，聯合國部隊應該稍遲一些才開進來。

敵人对匈牙利居民的影响，他們对工人階級的暫時影响，其原因究竟何在呢？一个答案是：匈牙利工人階級本身的性格。在1945年前，匈牙利基本上是个農業国，工人階級人数很少，但是經歷过长期斗争，它甚至在霍尔蒂統治下，也曾在許多企業，例如在切佩尔工厂，在塔塔班雅矿場，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这个本来人数非常少的工人階級，在1945年后又被削弱了。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当然从工人階級当中抽調出了新的国家机构的干部，抽調出了技術人員和专家，来領導已經国有化的企業，还抽調出了軍隊的軍官和干部，首先是拥有90万黨員的龐大而統一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干部。同时，由于进行工業化，工人階級所占的百分比大大提高了。那些新的工人，那些流入扩建和新建的企業里的人，那些替代了轉而建設国家机构的老工人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們来自农村——而且絕不光光是来自小农家庭或是農業工人家庭。他們也来自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是手工業者、小商販、鞋匠、裁縫的子弟，他們进工厂来做工，是因为他們父兄的小生意不能給他們提供什么前途。他們——我們已經說过——也来自从前資產階級的队伍，敌对階級的队伍。

他們带来了許多成見，他們又沒有受到过以往在企業中对厂主进行几年或几十年斗争才得到的政治訓練。因

此，他們一開始就很容易接受一大堆錯誤的以至敵對的理論，尤其是那些偽裝為“社會主義”的理論。在10月23日以後的一段時期，匈牙利工人當中，曾經有過而且仍然有許多無政府主義思潮。例如有一個直到今天還傳播很廣的見解，認為不需要什麼政黨，不需要什麼國家機構，根本不要國家，工人們可以“自下而上”，通過工人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來組織國家與生產。

匈牙利工人階級的成份是如此，它所产生的困難，能不能克服呢？當然能，但是克服這些困難，這條道路並不是容易走的。人們大多是从切身經驗中學習的。因此，匈牙利的新工人本來可以通過切身經驗學懂社會主義是怎樣一回事，學懂下面的道理：在社會主義下，工人階級是在社會上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工人是起決定作用的人，因此負有責任。他本來還可以學懂：光是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社會主義的勝利還不是自然而然地一勞永逸有了保障，在直到社會主義勝利為止以前的每一個鬥爭階段，階級敵人都會企圖重新奪回地盤，這個企圖得逞或是落空，要取決於工人的警惕性有多高和力量有多強。

但是，如何能幫助工人學懂這些道理呢？那就要給工人以充份的參加決定問題的權利，並且充分而無保留地向他們指明各種困難和危險。換言之，就是要首先通過黨內和工會內充分而無限制的民主。只有這樣，工人才會學懂道理，才會成為一個有覺悟的階級戰士。

工人階級組織內部的這種充份而無限制的民主，據我們今天所知，在近年來是日益縮小了。當我們在1956年11月的這些日子裏同工人們談論過去的情形時候，他們總是埋怨一件事情：企業里規定定額的時候不征詢他們有什

么意見，牽涉到企業的種種決定越來越少交付討論，而越來越多用行政手段來規定，“不問我們的意見”，“什麼也不告訴我們”。但是，只是執行而自己參加決定，是什麼東西也學不懂，自己無法進步的。在11月中旬的一次交談中，國務部長馬羅山告訴我們說：“拉科西的嚴重錯誤，主要的不是在於把許多人冤枉關了起來甚至處決掉；這些錯誤是在於使工人階級產生非政治傾向。”馬羅山這樣提出問題，說明了他的政治眼光敏銳，這種政治眼光並不因為他個人的經歷而受到影響，——因為羅馬山本人，正是那些雖然忠於黨和工人階級的事業但卻坐了好幾年監獄的人當中的一個。但是，雖然如此，我覺得他的後一段說法似乎還不完全恰當。錯誤的政策，並不是使工人階級產生了非政治傾向，它使得工人階級很大一部分根本連過問政治的機會也從來沒有過。

在這種不明白局勢、看不清遠景的氣氛當中，每一個為人們所不明白的政治決定，每一個進行得有頭無尾的討論，就必然使一切情況弄得更糟。在這些日子裡，一個老企業幹部幾乎一字一淚地告訴我們說：“我們花了好多年來建設杜安佩特雷（杜安佩特雷是匈牙利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我本人也親自參加了杜安佩特雷的建設工作。我作出了犧牲，我幾乎一天空閑日子也沒有過。我的妻子在家裡罵我說：‘你這傻瓜，自己斷送自己。你干嗎不另外找個輕鬆一些的工作呢？’我回答她說：‘因為匈牙利的全部發展取決於杜安佩特雷；我們一有了它，日子就好過了。’當她抱怨缺乏一個好鍋，缺乏漂亮的襪子的时候，我就對她說：‘好了，忍耐一下吧！我們必須把全部力量放在像杜安佩特雷這樣的企業的建設上。等到我們有了強大的基本工業，我們別的一

切也就都可以自給了。’但是几年前忽然又說，杜安佩特雷是錯誤的投資，建設这样的一些企業是錯誤的。我簡直覺得自己成了一只驢子。我为什么白白辛苦一場呢？我甚至不敢正面看我的妻子，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她会怎样来看这个問題。假如有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这为什么是个錯誤，有什么办法今后可以做好，那么，事情还不会弄到这样糟。錯誤是会犯的，人到底是人呀。但是从来沒有人解釋过。”

另一个工人也說了一段类似的話：“有一次，有人告訴我們說，一切都取决于基本工業和農業集体化的实行。后来1953年納吉来了，又告訴我們說，过去全錯了，應該另外采取办法。过了一会兒，又有人說，納吉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該把經濟政策再来一次修改。沒有一個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假如有人把事情解釋清楚，假如大家对事情进行一番討論，那么我們全体本来可以从这当中學懂一些东西。但是，当时只是翻来复去，到最后，大家再也不信任任何人了。”

在这种气氛当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来到了。如果对大会所提出的各种政治問題，对在大会上得到的新認識进行徹底的民主討論，那么，整个党，以至党外整个工人階級，本来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並沒有討論过，只是簡短地报告一下，討論並沒有由党来領導和指引，而是陷于自流——起初在党内，很快就發展到党外。結果，过了不久，誰也不能够把本質的东西与非本質的东西分开了。批評与分析过去的錯誤，其唯一意义本来是要帮助現在与将来执行一种更好的、摆脱这些錯誤而不致重犯的政策，但是，現在这种批評与分析却讓位給了一种乱七八糟的对过去的自怨自艾式的挑剔。这就使得忠心耿耿的好干部好像

挨了当头一棒，說：“現在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同时，在党外，对过去几年来發生的事情流傳着种种荒誕無稽的妄測。当然，階級敌人就利用了这个局势，插进了一些謠言和一些窃窃私語的惊人消息，这些謠言和消息首先是要給人們灌輸一种这样的想法：“过去全搞錯了，过去全是罪恶——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已經不行了。”而人們当中，有許多人过去不是以他們的知識和經驗，而是以他們那种沒有牢固政治基础的信仰为指南的，現在呢，他們的信仰丧失了。

好几个月来，已經看到了有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在醞釀着。党本来还是能够出来干預，并号召工人階級提高警惕，注意防衛的。但是党分裂成了宗派。布达佩斯一个工人区的一个区干部告訴我們，最近几个月来全区范围的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当我到区领导机关去替我們企業交涉一件事的时候，我最初走进第一間房間。那里面坐着一个派別。比方說，他們对我說个‘不行’之后，我就根本不再設法同他們商量。我干脆到隔壁房間去。那里面坐着另外一个派別，它在大多場合都向我說：‘可以’。当然也常常是恰恰相反。我們好几个月来就是这样工作的。”

列宁曾向所有共产党人遺言，說必須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党的团結，这句遺言，在匈牙利一定曾在許多演說中和許多課程中再三提到过并且研究过。只不过是沒有照这样做。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眼珠，眼珠就会受損害。眼珠一受損害，人就成了瞎子。面对着醞釀着的事情，匈牙利工人階級当时的确是瞎子。

虽然如此，甚至在10月23日之后，匈牙利还有数以万計的优秀工人准备手执武器起来以生命为代价保衛人民

主制度，只要有人告訴他們人民民主制度在危險中，只要有人号召他們就成了。但是并沒有人告訴他們。納吉和他的朋友們宣告說，反革命是一次光榮的起義，他們盡力解除工人的武裝，不讓工人參加斗爭。他們在叛賣了黨之后，也叛賣了工人階級。接着他們就迫使黨陷于瓦解。

匈牙利工人沒有領導，迷失方向，手無寸鐵地面对着反革命對一個人民民主國家所曾經發動過的一次最嚴重、最危險的進攻。他們受到了迷惑，經過了好多個星期和好幾個月，混亂狀態才勉強消除，這難道是奇怪的事嗎？

亮着燈的窗和暗黑的街牆

所以，這就是1956年11月的布達佩斯，煙囪不冒煙的布達佩斯，電車、公共汽車和火車停着不開的布達佩斯，馬路上夜里有槍聲的布達佩斯——仍然在死亡邊緣上的布達佩斯。蘇軍在那里，它已經把匈牙利從反革命的勝利下、從外國干涉下拯救了出來。它阻止了一個新的法西斯主義在匈牙利出現。

停在布達佩斯街道上的蘇聯坦克，對許多人來說，意味着他們有了免除死亡的一種直接而明確的安全保障。對於現在帶着兒女到牛乳店买东西的婦女來說，蘇聯坦克意味着她已經不需要在地窖里躲起來了，她和她的孩子已經不再需要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準備死在被炮火擊毀的房屋的瓦礫下了。對於在同一條街道上的——一個一輩子當了工會的幹部或是另一個工人階級組織的幹部的工人來說，蘇聯坦克意味着他和他的朋友們夜里不再需要在一个住宅里堆起防禦工事并實行警戒，以防止一群武裝分子拿着名單挨家挨

戶地闖進他們的住宅，開槍把他們打死或是刺死。對於匈牙利農民來說，蘇軍的坦克，意味着他們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不會有艾斯特爾哈齊和明曾蒂來重新奪去他們的土地了。對於大企業的工人來說，這些坦克意味着馮·西門子先生和他的西德工業同行們再也不能從人民手里奪去這些企業了，因為匈牙利的大門現在已經向西德的這班老爺們關上了。

蘇軍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不顧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暴怒與痛恨的咆哮，而這樣做了的。但是蘇軍只能做到這個地步為止。把匈牙利徹底從反革命威脅下拯救出來，在政治上戰勝反革命，今後繼續保障人民民主制度不受敵人侵犯，這都是匈牙利人自己的事情，這是匈牙利共產黨人的任務。這是蘇軍所不能越俎代庖的，蘇軍也不應該越俎代庖。因為蘇聯做的是保衛各國人民不受他們敵人的侵犯，使他們能夠自行決定和安排自己的命運；而對他們國家的責任，是在他們自己肩上的。鬥爭是他們的鬥爭，痛苦是他們的痛苦，勝利是他們的勝利。

這個鬥爭開始於 1956 年 11 月。

在這些日子里，直到後來很久，國會大廈的窗口，都是徹夜通明。新生的匈牙利的心脏，就在國會大廈里面跳動；政府就在這裡，重新開始工作的少數幾個部在這裡，以政府名義向匈牙利人民講話的廣播電台也設在這裡。

組成新的匈牙利政府的人，大多數同時領導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黨臨時中央委員會。他們是一些在危險達到千鈞一髮的時候與納吉及其朋友決裂以便拯救匈牙利的人。總理卡達爾·亞諾什，在霍爾蒂統治下曾是匈牙利地下黨組織的領導者。在人民民主制度下，他起初任內政部長——

后来他坐了好几年的监狱。由于过去的错误，卡达尔曾付出了代价，好几个月被单独拘禁，被禁止握笔书写，经历了深重的痛苦。但是卡达尔是共产党人；正因为他是共产党人，他的遭遇一刻也没有动摇过他对党的忠诚。当党需要他的勇气、他的精力、他的信念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

当纳吉组成他的政府的时候，卡达尔、明尼赫、奥普罗和其他一些依然是共产党员的人，参加了这个政府，希望尽力挽救应该挽救的东西，保存住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这也许可能办到的。纳吉不是宣告过他所希望的也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更好的、清除掉错误的人民民主制度吗？他不是三番五次信誓旦旦，说他对党及其事业是忠心耿耿的吗？政府里不是有一些像卢卡契·捷尔吉这样的人吗？他这个转瞬间被事件的暴风从教席吹到了部长交椅上的作家兼科学家，虽然政治上认识不清、糊涂，但是——正如他们所承认的——他是有一番好意的。也许可以进行合作，影响并说服纳吉和他的一群，并且争取时间——为了重建破碎了的党，这种宝贵的时间是必需的。

几天之后，发现这个希望是徒然的。纳吉并不打算保存人民民主制度，而是打算摧毁它。他一步步地走进敌人的阵营；卢卡契和其他也许抱善意的人，像一些掉到了一道汹涌的山洪里的人一样，被一起拖到反革命的深渊里去了。

从10月底起，纳吉和共产党员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断绝了。越来越明显，每过一天，匈牙利就更加接近灾难一天。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看到这一点的不光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有正直的非共产党人。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不能这样下去，”他说。“制止这种疯狂吧！我和每一个正直

的人都跟你們站在一起！”

11月初，破裂發生了。當納吉正在布達佩斯企圖在各個舊政黨幫助下成立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的時候，共和國主席團主席——按照憲法唯一有這種權力的人——却在離布達佩斯幾百公里的一個城市索爾諾克批准成立了一個新的匈牙利工农政府。卡達爾·亞諾什擔負了總理的職務。

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搞地下工作，在革命當中進行戰鬥，甚至也許在街壘上犧牲生命，這都要有勇氣和自我犧牲的決心。可是，像卡達爾和臨時中央委員會與新政府其他同志那樣的做法，恐怕需要的勇氣就還更要大些。在一個居民一般還不理解10月23日和11月4日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大多數居民還未了解到所謂革命其實是血腥的反革命的這樣一個國家里，那些挺身而出抗拒反革命的人，會被許多人當作是賣國賊，當作是人民公敵。外國的全部仇恨和全部暴跳如雷的宣傳，必將集中火力在他們身上；他們將會被國內的反革命分子每天每小時地咒罵、污蔑，並當作血腥獨裁者來加以誹謗。卡達爾和他的朋友們知道，只要混亂狀態一天在匈牙利占統治地位，他們就會受到匈牙利許多人的痛恨。雖然如此，他們一分鐘都不猶豫，把這一切都承擔下來。

幾個星期後，有一個代表團對卡達爾說，他在國內沒有聲望。譬如說，納吉，那他的聲望就大得多了。只有當他，卡達爾，做出一些使他也“得聲望”的事情，人們才能接受他。卡達爾由於他整個過去的經歷，由於他在拉科西執政下坐過監牢這一個事實，本來可以很容易以“拉科西政權的受害者”的面目，浮游於廉價聲望的濁流之中，但是，他却一針見血地回答說：“你們所指的聲望，我本來是可以通过廉價的

煽动宣傳来取得的。但这样的声望我宁可不要。”

政府和临时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成员是明尼赫·费伦茨。他一开始就担负起来的任务之一，是特别艰巨的。这就是重新组织已被完全摧毁了的警察机构以及初时仍然完全陷于解体与混乱之中的军队。明尼赫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成立两个警察团，其任务是对匪徒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保卫居民至少不遭到最恶劣的骚乱和劫掠的损害。这两个团——后来又加上了第三、第四个团——是由企业工人、前抵抗战士，首先是由曾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前国际纵队队员所组成的。国际纵队的队员们懂得一点——就是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信赖自己的上司明尼赫。他不光是他们的上司，而且也是他们的伙伴，他曾和他们一起，在瓜达拉哈拉和马德里城郊，在布鲁涅特和西班牙其他的战场上同患难，共战斗，分用过最后一批弹药，分吃过最后一片面包。他在西班牙战争中担任过匈牙利纵队的司令员。

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第三个成员，是马罗山。马罗山在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也很长，但他不是作为共产党人，而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他是一家面包厂的工人，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企业里组织工会和党的小组。受到迫害，逃了出去，另外找到个工作，再组织，再逃出去——如此周而复始，一直到面包厂工人马罗山上所有厂主黑名单为止。知道他过去历史的朋友们，一想到他怎能在这样的时刻不致饿死，怎能两天、三天，甚至往往四天靠一片干面包过活，就诧异地摇摇头。他虽然已经到了能当一个绝食表演家的地步，但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一旦奇迹般地找到工作，就马上又开始进行组织工作，又一次逃走。

在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时候，馬罗山很快就成了統一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干部之一。他也和卡达尔一样坐了好几年的监牢。但和卡达尔一样，他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一刻也没有妨碍他在匈牙利最艰苦、最危急的局势下参加新政府，领导新的党，并把在这种局势下显得特别沉重的责任担负起来。

这就是新政府和新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人物。其余的人也是一类的人物，勇敢、忘我——都是共产主义者。匈牙利的未来、党的重建，其责任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们是如何开始进行工作的呢？馬罗山在一次谈话中给了我们回答：“我们说明真相，我们确定了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我们一步也不肯离开这条道路。”

政府 11 月 4 日的第一个号召书中说：“匈牙利的弟兄们！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同志们！我们国家正经历着一个沉重的时刻。工农政权和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危险之中。巨大的危险威胁着过去十二年来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你们，匈牙利劳动人民，而首先是你們，匈牙利工人以自己的双手经过英雄的忘我劳动而取得的。反革命阴谋分子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们残酷无情地迫害民主的拥护者，尼拉什分子和其他法西斯凶手杀害忠诚的爱国者和我们优秀的同志。……他们已经伸出手来触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这就是说，他们打算把工厂归还资本家，把土地归还地主，他们打算重新让宪兵、旧军官、整个令人诅咒的、敌视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旧制度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如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给你们带来的不会是自由、福利和民主，而是奴役、贫困、失业和残暴的贵族压迫。”号召书最后说：“匈牙利人！弟兄们！爱国的人们！士

兵們！公民們！应当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橫行霸道。行動的時刻到了。我們捍衛住工农政權和人民民主成果。我們要恢復秩序，在我國確立安全和安寧！人民的利益、祖國的利益要求建立一個堅強有力的政府，建立一個有能力使國家擺脫目前的嚴重處境的政府。因此，我們組成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下面接着提出了新政府的綱領，其中最重要的要點，是保障匈牙利的民族獨立和主權，擊退一切進攻以保衛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捍衛與保障社會主義成果，恢復國家的安寧和秩序。

這是一個十分明確、十分勇敢的綱領。它首先是一個在匈牙利開頭第一次指出匈牙利受到反革命威脅，並號召工人去執行一個決定性任務即鎮壓反革命的綱領。現在，政府是用什麼辦法來着手實現這個綱領的呢？

它能夠用武力，靠警察和軍隊來實現這個綱領嗎？用武力和軍隊，可以擊敗武裝集團並把它們繳械，可以制止匪幫用機關槍和大炮在城市和鄉村建立恐怖統治。但是用武力是不能在政治上擊敗反革命的。在這些日子裏——在11月初——反革命的力量仍舊在於什麼地方呢？在於他們仍然能夠使得那些既不擁護明曾蒂也不擁護艾斯泰爾哈齊的普通人去為明曾蒂和艾斯泰爾哈齊作戰而不自覺。那麼，怎樣才能對付反革命呢？那就要把那些被反革命派到街壘上替它作戰、被反革命利用來繼續進行罷工和射擊的人，從反革命那邊拉出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那就要說服這些人，向他們指明，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他們被利用來幹嗎，那就要告訴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就是說，需要討論、討論、再討論，這是一條艱苦的、漫長的、但是唯一可能的說服的道路。

国会大厦的窗口，为什么到清晨三点、四点、五点鐘的时候还亮着灯光呢？为什么政府办公室里的灯光，一直到晨光曦微的时候才灭呢？因为在这些黑夜里，政府的成員，首先是卡达尔，正在跟一个又一个的工人代表团在討論。人們来自布达佩斯的許多区域，但他們首先是外省各区域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和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代表。組成这些团体的，特别是組成外省各工人委员会和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大部分是一些既非真正工人，也从来没有由各企業民主选举过的人物。尤其是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各企業中往往是靠实行种种威胁而按照霍尔蒂分子或是箭十字分子的提議得到任命的“工人代表”所組成的，他們本人往往就是过去的霍尔蒂分子或是过去的职员或手工業者。占有一定百分比的，是一些前面已經提到过的“騙子”，这是一些通过特別响亮的叫声和特別蠱惑人心的要求来哗众取寵的人。但是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人委员会里，还有一些正直的、真心誠意希望社会主义的人，还有一些不像別人那样糊塗的人。如果說服了这些人，那就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这些漫漫的长夜里，討論着一些什么事情呢？在这些弥漫着香烟烟霧、充滿了潮湿衣服气味的房間里，究竟談一些什么事情呢？代表团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大都是政治性的要求：撤退苏軍，接受納吉参加政府，釋放被捕的反革命头子之一馬勒特。偶尔——稍为不常見一些——也提出重新允許資產階級政党存在并举行普遍自由选举的要求。

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恢复工作。

在所有政治問題上，卡达尔和政府其他的部长态度很坚定。他們三番五次地表示願意調查提出的申訴，消除过

去的錯誤，注意使錯誤不致重犯，首先是保障勞動人民所享有的最廣泛最積極的民主——並不是因為別人這樣要求，他們才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確深信有採取這些步驟的必要。但是，他們拒絕了一切會為反革命大開方便之門的要求。他們再三解釋說，一俟布達佩斯市內安寧和秩序恢復，蘇軍就將撤出布達佩斯。工人們自己越是迅速保證恢復安寧和秩序并把反革命鎮壓下去，他們的要求就會越快得到實現。當人們向卡達爾提出釋放馬勒特的要求的時候，當人們甚至要求他容納馬勒特參加政府的時候，他回答說：“在我們還未談這個問題以前，你們先告訴我，你們究竟知道馬勒特多少情況。”工人們露出窘困的樣子，誰也回答不出來。於是卡達爾就對工人說，他真不明白，工人們為什麼偏偏對馬勒特這樣關心，馬勒特從來沒有做過工人，他在世界大戰期間是霍爾蒂的軍官，作戰中被俘，直到1945年之後很久才出頭露面。“這是我們原來不知道的，”有些工人這樣說，他們並且承認說，容納馬勒特參加政府的要求，不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而是“有人”告訴過他們，要他們這樣要求的。對於舉行選舉和允許資產階級政黨存在的要求，政府成員們再三解釋了，如果實現這個要求，那結果會是如何。這些談話重復好幾個鐘頭。於是一些代表，三個、四個、有時甚至六個或八個，看清楚了政府有道理。隨着日日夜夜這樣過去，起初一個，後來好幾個代表團慢慢地、躊躇地、帶着保留地宣稱，應該設法恢復工作，當然，他們不能許下確實的諾言，他們不能承諾無條件復工，有許多事情要取決於同伴們的意見，許多事情要取決於政府本身的做法。

為什麼政府把復工的要求放到第一位呢？這是由於經

济的原因嗎？是因为生产归根到底要恢复进行，是因为每不工作一天，就要花費大笔的金錢，使得經濟灾难更加迫近嗎？这是原因之一，但在这些日子里，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不复工，就不能战胜反革命。工人一天不到企業上班，別人就一天不能同他們談話，就不能幫助他們看清楚，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如果他們不協助制止反革命的話，還可能發生些什麼事。人們一天坐在家里或是帶着妻子上街买东西，他們就一天依然是单独的个人，別人就無法接近他們。但是，要緊的事情恰恰是要接近他們，以便至少能告訴他們，匈牙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而有决定意义的困难：在匈牙利居住的九百万人当中，只有比較少的人在這些日子里知道 10 月 23 日和 11 月 4 日之間真正發生了些什麼事。几乎沒有誰知道白色恐怖的猖獗程度，几乎沒有誰知道匈牙利边境上情况如何，国际反动派是如何在把自己的全副力量投入匈牙利。

这种情况怎會發生的呢？首先，国内好几个星期沒有出过報紙，郵政不通，電話不通。从布达佩斯的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就無异于进行一次漫长而危險的远征。从布达佩斯到別的地方，例如到吉厄尔，就根本不可能。有一件小小的事实，說明了交通是如何陷于停頓状态，每一个城市是如何与其他城市隔絕：在吉厄尔，在这些日子里——在 11 月中旬——已經出了两份報紙，其中已經有一份是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報紙。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們收到这些報紙的最初几期，还是通过我們手里才收到的，因为我們在吉厄尔买了这几份報紙，隨身帶了来。他們自己仍然不能够和吉厄尔取得經常的联系。

因此，在这些日子里，匈牙利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在11月中旬以前，甚至是每一条街道——都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结果，住在布达佩斯第七或第八区一条街道的人们，就再也知道例如第九区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在切佩尔、巴雅或是塞格德，那就更不必谈了。他们也许会知道，有些武装匪帮在他们那条街道或是在他们邻近的一条街道杀害了一两个人，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就根本连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恐怖匪帮往往是在夜间来的，在11月1日之后尤其如此。关于这一两个被杀害的人，人们告诉他们，这是一些“特别受到切齿痛恨的保安警察人员”。无数人坚信这一两个他们偶然知道的遇难者就是唯一的遇难者了。所以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看来就似乎是一次“不流血的光荣起义”，在这些事件中只有偶尔两个特别受人痛恨的人丧失了生命。例如在布达佩斯的一座有将近二千名工人的大翻砂厂，直到复工开始之前，工人们还坚决相信，在11月4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损失过一根毫毛。直到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才看清楚，原来光是他们这个企业，就有十四个人被白色匪帮杀害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改变对纳吉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的估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先决条件是复工，是他们集合到企业里来。

大多数人甚至对于布达佩斯巷战的规模有多大，也不清楚。他们虽然不但听到了轻武器的声音，而且也听到了炮声，但是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俄国人”用大炮轰击布达佩斯。在许多企业里，比方说，工人们有一些同事，在市委大楼被围期间，曾经在场目击，后来告诉工人们，有人如何在一个住宅区里开大炮轰击市委大楼，直到这时候，工人们才知道了反革命分子对这座城市的轰击真正达到了多大

的規模。

是什么人坐在那些“革命委員會”里或者指揮着“自由战士”的武装队伍，这也是几乎誰也不知道的。許多人曾經在自己区里，或是在本企業的工人委員會或“工人武装队”里，發現了一些他們以前就認識的人，这些人或則是箭十字分子，或則是霍尔蒂軍官，或則純粹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他們看到这批人，就感到詫异，或是感到气憤，但是他們觉得，在一場“革命当中，这样的分子总是会浮起来的”。一直到他們知道了这些分子不光是在他們这里出現，而且到处都出現，他們才看清楚，原来这批人的出現并不是一个例外情况，而是一个通例。

关于大批法西斯分子越过边界一拥而入，关于运送武器的事情，在这些日子里，几乎任何人都根本不知道一点点情况。偶尔在某处有些人碰巧看到了別人在所謂食品箱子里發現了反坦克穿甲彈，在标着“綳带”字样的箱子里發現了手榴彈。另外一些人偶然發觉，“他們自己的革命委員會”里，有一些一星期前还住在西德的难民营里的人在活动。这一切是怎样弄进来的，規模有多大，当然誰也無法加以估計。因为誰也不曉得全面的事实。直到政府追查了所有的綫索，收集了所有的事实并加以公布之后，人們才获得一个清楚的印象。但是这种情况仍然持續了很久。

誰能同人們談話呢？誰能打通他們的思想呢？政府嗎？政府可以同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乃至一百个代表团打交道，但是却無法与千千万万的人打交道。即使是報紙，也不足以把一切应說的話說尽，也不足以說服一切人（而說不服一切人，就無法繼續前进）；因为第一，報紙在这些日子里出版得很不正規（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也在罢工，報紙是

在外省印刷好，然后用大卡車运到布达佩斯来的)，第二，在这些日子里，許多人对于共产党人的报纸，对于政府的报纸上所講的話根本不相信，或者甚至不看这些报纸。必須使用另一种力量来使工人們到企业里去，以便进行并打赢这场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这种力量，就是全体共产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的情况怎样呢？它的活动在哪里呢？

在納吉执政的日子里，統一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瓦解了。但是甚至在这些日子里，也有数以千計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繼續执行了自己的共产党员义务，这往往是既沒有上面發动，也沒有任何领导，一切靠自己主动。有無數这样的例子：

早在进攻党市委大楼之前，反革命就在各个区里开始对党区委办公大楼或是工人住宅实行武装襲击。在这些区里，住着一些工人。这些男女一看到了反革命的企圖，就拿起了武器，往受到威胁的区领导机关去，保衛这些机关。他們在建筑物里面筑起工事坚守，他們把窗戶和其他孔洞变成枪眼。圍攻开始了；往往時間长达好多天。守衛的人們一直射击到他們的彈药用尽或是他們倒下来为止。許多人受了伤还繼續射击一两天。在战斗間歇的时候，有人通过后門或是走廊溜了出去，弄到——一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知道是如何弄到的——新的彈药。有时候，但是很不常見，也有附近某座房子的妇女鼓起勇气来給他們送食物。在大多数場合，他們是餓着肚子作战，或是三四天只吃一片干面包。

有一些年輕的姑娘和妇女，一些女同志，在这些日子里組織了搬运受伤战士的工作。“自由战士”也力圖截住运送

受伤的共产党人的救护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对伤员施行屠杀。姑娘们和妇女们在她们的上衣底下带着枪支或是手榴弹，她们就靠放枪或是扔手榴弹来击退那些企图对伤员施行私刑的“自由战士”，用她们的车辆来安全运送这些伤员。今天在布达佩斯有一些年轻的姑娘和有了两三个孩子的妇女，她们曾经安全运送了八次、十次、十二次伤员，同暴乱分子进行过一二十次的枪战，打败了他们。

有一些年轻的工人保卫住了他们的企业，挡住了反革命。他们往往人数很少，但是这少数的人却一连好几天抵挡住暴乱分子，挽救了企业免于毁灭。例如在切佩尔，十七个工人一连三天保卫住了他们的企业，抵抗住二百多个企图把这企业烧掉的“自由战士”。十七个保卫者只有几支枪和很少一点弹药。虽然如此，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那些以手榴弹武装起来并且甚至两次出动了机关枪的人。他们成功地造成了一个假象，好像有一批为数多得多的人在工厂里设了防。直到三天之后，他们才不得不撤退。不过，到这时候，该工厂的其他工人已经到达了。这些工人虽然宣布罢工并把企业关闭起来，但却防止了企业的毁灭。

有些士兵、军官和警察，他们——大多数是在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情況下——参加到保卫某个部、某一公共建筑物或是党办公大楼的人们当中去，虽然他们很明白，他们这些穿着制服的人，是绝不会得到宽容的，到他们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人家无论如何一定会一面喊着“消灭保安警察！”，一面把他们吊死或是殴打至死。在消防队员当中，也有一些同志，同样没有经过别人要求，就在被“自由战士”纵火焚烧的建筑物、企业、文化机关里进行救火。前来救火的消防队，到处都三番五次地碰到了枪击和手榴弹。但是许

多消防队员并没有被吓退。他们向周围的人喊叫说：“你们打算焚烧的是人民的财产”，并且在枪林弹雨中继续灭火。

正当这些同志大多数还在战斗着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来，他们听到说，纳吉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宣布举行选举并容许资产阶级政党活动，他们听到了退出华沙条约、要求西方援助的消息，他们获悉了党已经瓦解。要是在别的时候，这些消息就会使他们颓然倒地，因为他们们的世界垮台了，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来倒在地上，他们必须战斗。这样，他们的世界没有垮台，这个世界仍然活在他们身上，活在他们们的斗争当中。他们听到成立新党的号召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诧异；对他们来说，共产党从来没有垮过台，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党，他们现在知道了，党已经更年轻、更纯洁地出现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正在这里为了使党重新出现而战斗。许多人一直到苏联坦克隆隆地开过街道，苏联士兵——前来给他们助一臂之力的朋友和兄弟——向他们的敌人和进犯者开火的日子，才放下了手里的枪支。他们跨过被炮火打碎了的台阶，跨过瓦砾和破碎的玻璃，冒着烟雾和火焰，从他们曾经保卫过并且守住了的房屋和企业里走出来，走到露天的室外。但是他们的斗争在这些日子里并没有结束。这个斗争刚刚才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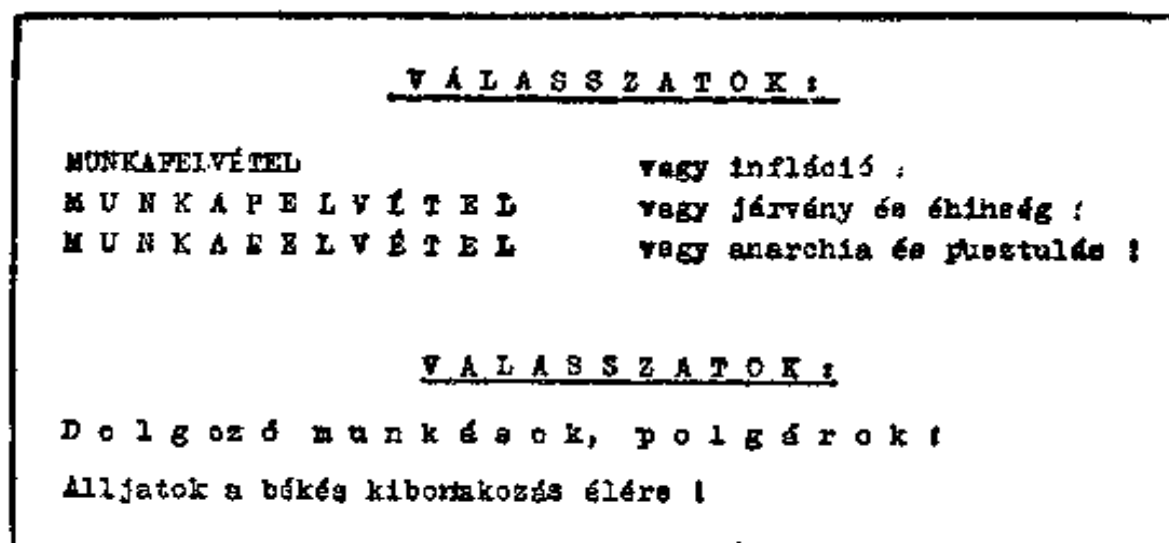
在11月4日至8日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布达佩斯的马路上仍然在巷战。尤其是夜里枪声很多。在这几天夜里，在马路上可以看到小群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墙边忙碌着。他们走开的时候，墙上贴着小张的传单和号召书。这些人并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号召继续顽抗的暴乱分子，而是共产党人。

在战斗的日子里，在彈痕累累、破碎不堪的区领导机关里，有时也在私人住宅里，四五个人集合起来，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是已經瓦解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干部。他們大都是直接从战斗中，从保衛楼房和企業、反抗武装匪帮的斗争中来的。許多人带着伤，許多人一連好多天沒有睡过觉，沒有吃过东西。他們成立了最初的临时领导机关——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区委员会。

沒有报纸，电台广播的消息也很少。人們在馬路上行走时唯一讀到的东西，就是各种“革命委员会”和“委员会”貼在墙上的招貼。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用这种方式开始向人民講話。它的党员們每天夜里貼在墙上的招貼，样子显得很原始。这有助于引起人們的兴趣，因为这些原始的、往往是用手写的、通常是用打字机打出的、最好的情况是油印的、但几乎从来不曾用鉛印的招貼，与过去那些鉛印得十分精美、常常十分冗长的、受到人們一定的怀疑的官方告示，样子看起来有天淵之別。但目的并不在此。在破碎不堪、彈痕累累的区领导机关里，通常再也找不到一部完整的油印机，連打字机也往往要从瓦砾里挖掘出来，設法修理好才能用。有时候連这一点也办不到，于是同志們就用手把他們的招貼抄五十次、一百次、两百次。

“情况也就是这样，”一位妇女笑着对我们說。她是布达佩斯一个工人区的区委员会临时書記。“前些时候，对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工人沒有打字机，更沒有油印机。我們当时办的一份报纸，不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办的，倒像是法西斯統治下的工人或是反资本主义斗争初期的工人办的，这一点对我們的帮助很大。我們在这几个星期里学到的东西，从前五年也是学不到的。”

招貼上写着些什么呢？区领导机关的这位女同志拿出了几份。这些招貼很小，大都只有一个句子，一个要求：“你罢工，就是夺去你自己孩子的面包。”“你如果希望战争和混乱，那就繼續罢工吧。你如果希望和平和社会主义，那就上工吧！”“你希望苏軍撤出布达佩斯嗎？等到你把秩序恢复，它就能撤出了。”



貼招貼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其所以不轻松，是因为同志们夜里已經累得要死了，因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白天做的。这个工作首先就是把其他願意工作的同志集合起来。最重要的是重建企業的党組織。当然，把这些組織按照从前曾經达到过的那樣大的規模重建起来，是談不上的。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大翻砂厂里，过去企業党組織有一千三百名党员。現在有四位同志到区领导机构来报到，其中有一位甚至在納吉政府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还設法留在企業里，以便与在那里的工人保持联系。在11月，新的企業党組織有十七个党员，12月中旬有六十个。

所有重新組成最初一批黨組織的同志，都是在企業里工作了好幾年甚至往往好幾十年的。雖然他們受到迫害，情況又是那樣混亂，其他工人對他們仍然是信任的。現在，正是他們，在星期五或星期四，即在罷工者仍然領工資的那一天，在廠里站着，和伙伴們辯論——主要是辯論復工的必要性問題。企業里其餘的同志覺察到重新出現了一個組織，或者至少是一個組織的核心，就參加進來。到11月中旬，各企業里已經有了十五到二十人的黨組織。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了，已經可以開始認真地工作了。

重建被打散了的企業黨組織，開始對各企業并在各企業內進行工作，召集願意工作的分散了的同志，這就是各個臨時區委員會白天的工作。至於上級黨，當時還沒有市級領導機關——只有臨時中央委員會。上面的政治指示和訓令，當然是沒有的。同志們根據臨時中央委員會所能提供的少數幾個政治分析，和臨時中央委員會所決定并在電台中宣讀（這是經過與電台人員進行了長時間鬥爭之後）的新黨第一個政綱，以及卡達爾的一些演說，來確定自己的政治路線，規定自己的具體工作任務。直到11日晚上，才在黨辦公大樓舉行了黨的一個積極分子會議，會上卡達爾對事件作了一個分析。連這個積極分子會議，也只包括了一小部分的黨工作者，能夠得到通知或是湊巧到了這大樓里來的人，就到了會。

這樣，晚上的時候，臨時區委員會的同志們就和那些已經重新成立了一個黨組織的企業的同志們在區領導機關里集合在一起，討論局勢，並且決定他們第二天該在他們區里做些什麼。“當時幾乎像是搞地下工作，”那位區女書記笑着說。“我們一切全靠自己，誰也不能告訴人家如何做，大

家都要自己作出估計，自己決定該做些什麼。這是很吃力的，但很有好處。因為我們通過這樣學會了的東西，是別的時候好幾年學不會的。”

參加晚上的討論（在這個時候的布達佩斯，“晚上”是從下午三點半至四點左右天色變暗的時候開始的），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毫無危險的事。沒有電車，沒有交通工具。步行通過暗黑的街道，需要有很大的自制力，因為拐彎的時候，仍然有可能遭到一陣機關槍掃射。在各區領導機關——附帶說一句，在“人民自由報”的編輯部也是如此——在這些日子裡可以看到到處都放着行軍床和草墊子。許多同志就睡在編輯部或是區領導機關里。這第一是為了節省回家的一段路程，第二是為了安全——因為一份黨報既然不顧印刷工人和記者的罷工而仍然出版，它的編輯就馬上上了黑名單，被認為是“破壞罷工的工賊”，對他來說，恐怕再也沒有比已為人所共知的住宅更為危險的地点了。那些企圖繼續施行白色恐怖的武裝匪幫，並沒有全部被鎮壓掉呀！一個進行重新建黨工作的區幹部，所處的環境也是一樣。

過了一個漫長的、全部時間都在工作和開會的白天之後，臨時區委員會的同志們和其他自願參加工作的同志們，就拿起了傳單和漿糊桶，帶着他們的招貼走出外面去。他們往往還要繞路走，以避開那些武裝匪幫。而且往往有子彈打在離張貼招貼的人們才一二公尺遠的牆上。

雖然如此，參加夜間張貼工作的人的數目在慢慢增加，起初十分慢，後來稍為快了些。“有一次，”另一個區委員會的一位女同志說，“我們遇到了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那大概是在10日或是12日的事；我們正要張貼，來了一群少

年，問我們在干嗎。我們認得這群人，他們在11月初曾經反對過我們。我們心里想：哎，糟了，他們人數占優勢；但是我們當然回答：‘我們去為社會主義工人黨貼標語！’這些少年人表示出很感興趣的樣子，問我們反對不反對他們參加一份。我們當然不能說不行，但是我們心里并不舒服。這些少年跟我們去了，我應該說，他們幫了我們很大的忙，第二天晚上，他們又來到，跟我們去，後來每天晚上都來，好像成了不必多說的規矩似的。昨天這群人當中有一個人到我們這里來，告訴我們說，他們願意加入黨。我們十分高興，但是有點奇怪，我們知道，他們曾經反對過我們。但是這些少年說：‘我們已經看到你們在做些什麼，你們每天夜里都為了黨而冒生命危險，而且一點也不聲張和夸耀。你們為了黨冒生命危險，為黨工作，這樣一個黨是我們所喜歡的。我們願意和這樣一個黨站在一起。’”

政府和黨的工作，開始緩慢地、相當緩慢地取得成績。一個企業復工，第一天只到職工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然後更多的，兩個、三個、四個企業跟着復工；別的工廠的工人看到附近一個企業的煙囪已經在冒煙，就在發工資的時候聚集在一起，猶豫而沉思地說：“現在也許是重新站在機床前面工作的好時光了。我們不能再閑坐下去了。牆上的招貼說得有道理。——我們如果不工作，又哪里來的糧食和衣服呢？”

在11月10日和11日，牆上的招貼有百分之九十或是八十是各個暴亂分子的組織貼的，至多只有百分之十或二十是社會主義工人黨貼的。過了兩個星期，比例差不多恰恰顛倒了。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招貼，現在還加上一些小宣傳畫，是黨貼的。作家、記者、其他知識分子仍然抱着拒人

千里之外的或是敌意的态度站在一旁，他們仍然宣告不与“卡达尔卖国政府”合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許多过去的党员与干部仍然表現消極。他們拒絕加入新党，宣称感到不滿与失望，他們先要觀望一下党如何發展，他們將給予党一个所謂考察期。两三个月后，他們才可以決定能否加入。

但是各区和各企業已經開始工作了，領導机关和临时組織成立了，虽然这些組織往往仍然是很小的。在11月20日至30日之間，一个又一个的企業复工了。往往由于缺乏煤和电的关系，工作不多，工人們常常互相一連进行好几个鐘头的辯論。但是他們已經集合在一起了，可以辯論了——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从11月中旬起，最初的一批電車第一次在布达佩斯的彈痕累累的馬路上行駛，在別的地方，打斷了的架空綫重新安装好了，軌道上的瓦砾和乱石挪开了。馬路上有大卡車駛过，人們小心翼翼地卸下它們的載貨，好像这是一些貴重易碎的东西似的——的确也是如此。这些貨物就是玻璃；在这座有人称之为沒有窗玻璃的城市的商店与房屋里，又重新第一次装上了玻璃窗。

在戶外，在城郊和乡下各地，已經生了锈的鉄路轉轍器又在唧唧作响，这些轉轍器經過了几个星期，現在又第一次动用了。第一批列車慢慢地在上面开过。在多罗格煤矿区，吊車不再寂然不动地停在纜索上了；它們已經开动，开始運轉——从坑道开到卸煤場，又从卸煤場开回坑道。生命在匈牙利慢慢地苏醒了。

它的胜利已經有了保障嗎？反革命已經被战胜了嗎？一个回合是打贏了，但是一場大战还没有打贏。

力量的考驗

匈牙利重新工作了，人們開始修理自己那些破壞了的房屋、損壞了的住宅。還有許多問題、許多要求，過去的許多錯誤有待消除，新的途徑有待嘗試。

在平原地區的農民中間，即使小的困難也是相當少的。人們已經可以看出，反革命所提出的“打倒集體農莊，把土地分給個別農民”的要求，並不符合大多數農民的願望。農民得到了退出合作社悉聽自便的機會，但是結果只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利用了這個機會。到11月底，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的事實——一部分解散了的合作社，又自願地重新建立起來了。它們不一定都是完整的生產合作社，而往往只是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工作，進行一定範圍的活動，甚至有時候只是進行購銷——但是已經可以看出，農民是願意合伙的。關於這種共同勞動的方式，將來還要決定，將來還要嘗試很多東西，把一些經得起考驗的保留下來，把其餘的除去。但是這一切的辯論和嘗試，應該在安寧與友好的氣氛當中，在實事求是的交談和同志式的合作當中，而不是在鬥爭當中進行。

在企業里也有了新事物——工人委員會。它們目前還有兩點缺陷：它們的職權仍然不明確，它們的成份有問題。

關於它們的職權，仍然在討論中；政府和黨建議工人委員會從事於監督與推動生產，並且參與企業的計劃工作。工人委員會的權限達到多大的程度呢，它們與廠長和整個生產的領導機構的權限的關係如何呢，它們能夠而且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決定或參與決定企業該生產些什麼呢？如果企

業有了利潤，這些工人委員會應不應該能夠把這筆利潤的一部分分配給職工呢？它們應不應該能夠以利潤為目的而預先計劃自己的生產呢？如果這樣做，結果各個企業就會只生產能帶來利潤的商品，而對於別的商品，例如在最初幾年的生產不會帶來利潤的資本財或是新機器，就棄而不生產。能這樣做嗎？難道可以有一種這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它裡面所有的企業都生產如家庭用具之類，而不生產如采礦設備之類的東西嗎？這樣一種計劃，又怎能在人人公認為必要的全國性計劃的範圍內存在呢？這一切的問題仍然沒有弄清楚，只有通過實事求是的、友好的辯論——也通過切身體驗——才能弄清楚。只有這樣，才能克服第一個缺陷——而不是通過鬥爭和戰鬥。

第二個缺陷，即工人委員會的成份，只有隨着時間的過去而逐步克服，在這裡，也是通過民主的辯論與說服。在許多工人委員會里，有一些絕非本企業工人真正代表的人盤據着，他們是工人的直接敵人，是打進了工人委員會的霍爾蒂分子、箭十字分子、從前的企業主，或者有一些被10月日子的混濁潮水涌到了高處的根本頭腦不清的人。工人委員會一天是這個樣子，就一天沒有工作的能力。因為只有一部分委員真正關心工人的利益，而另一部分委員腦子裡想的卻完全是別的事情。但是這也不是用一紙命令或是強制措施所能改變的。應該進行工人委員會的改選，這一次是全體職工都參加的真正選舉，而在這個爭取一個真正的工人委員會的鬥爭過程中，共產黨人、工會工作者、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就應該贏得或是重新贏得別人的信任。

在布達佩斯的某些大企業，早在11月底，就舉行了工人委員會的改選。其實應該說是“初選”；因為原先的工人委

員会根本不是选出的。选举进行得非常民主。在一家大企业，即馬瓦格工厂，选举的情况如下：首先是所有各車間都集合起来选举。每一个車間可以选出五个代表，从代表当中选出最后确定的工人委员会。每个工人投交一个封套，里面有一張写着一个人名的紙片；得票最多的那五个人就算当选。然后再在全厂大会上从这些候选人当中选举最后确定的工人委员会，再一次投交写了人名的封了口的封套；得票最多的工人——总共三十二人——就組成了最后确定的工人委员会。有几点限制：候选人必須在本企业至少已有一年——在馬瓦格厂，人人都明白，必須防范那些在去年混进企业来企圖不干老实工作而干別的事情的人。在馬瓦格厂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在几个星期以前，全厂大多数人还站在这样的立場上：企业里不需要有共产党的組織，而現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組織的主席却被选为工人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了他之外，另外还有好几个共产党人参加了工人委员会。

因此，这一切只能在安宁与和平的气氛中，在实事求是的辯論中，在逐步說服人們的过程当中發生。要这样做，当然需要時間。开枪把人家打倒，是轉瞬之間可以做到的，但是同人家一起寻找一条新道路，互相討論，最后从許多道路当中找到一条最好的道路，这个过程却是很长的。而一个工人政府和一个工人政党对人民却只能走第二条路。它們不打算打击別人。但是人民敌人的想法和做法却与此不同。

为了建設自己的国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需要安宁和時間。但是它的敌人却希望它得不到这种安宁和这段時間。

正当匈牙利的情况日渐走上轨道并且在发展的時候，从国外仍然有一股洪流般的疯狂的血腥宣傳傾倒在这个国家上面。我們在12月中旬以前停留在匈牙利的期間当中，有几天曾回維也納。我們看見報紙的時候不禁抓抓自己的头。所有报亭和所有报摊都仍然标出耀眼的大字：“匈牙利的放逐”，“仍然在内战！”，“布达佩斯又一次新的起义迫在眉睫”，“国内死者数千人”，“俄国坦克天天向人群开火”。直到12月初，登在报纸头条第一版的，仍然是除了匈牙利外，沒有其他消息。

这似乎是荒誕無稽的。但这并不是荒誕無稽。报纸的标题和报上的恐怖消息，只不过是那件像从前一样对准匈牙利的心脏的宣傳武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邻近的中立的奥地利的居民处于經常的惶恐和憤怒状态。另一个最为危險的部分，是广播宣傳。

除了匈牙利的广播电台之外，每个匈牙利人的收音机都很容易收到維也納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自由欧洲”在匈牙利已經不再受到重視了；人們收听是收听，但是只相信一部分。反之，維也納电台，这个中立的奥地利的电台，却受到重視。而維也納电台在这些日子和这几个星期里，已經發展成为一个反对匈牙利的宣傳中心，成为对当时仍然在匈牙利存在的暴乱集团發布命令的傳令站。“自由欧洲”經常号召說：“請听維也納电台！”——維也納电台不光是把报上登載的恐怖消息全部向匈牙利發布，而且还加上自己的新消息——它的新聞节目一直几乎全部是匈牙利消息。而且維也納电台做得有点特別：它發出的关于事件的报导，是在事件發生之前——也就是說，它發出指示，要这些事件發生。

举一个例：11月份，維也納电台有好几次在晚上报导說，第二天将举行一个反政府的示威。这一天本来并没有任何示威的起因，但是一些武装分子集团馬上敏捷地按照規定的時間集合在維也納电台所宣布的地点，乱放几槍，然后再作鳥兽散。在布达佩斯，惶惶不安的人們交头接耳：“恐怕又要鬧了”；于是維也納电台的身价就抬高了——难道它不是有先見之明，預先說了剛才發生的事情嗎？

另外举个例子。在12月初的日子里，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会同塔塔班雅矿区的几个代表，正在和卡达尔总理談判。談判的問題是增加生产，特别是当时数量仍然十分少的塔塔班雅煤的生产。談判在晚上开始，进行了一整夜，到第二天上午为止。气氛十分良好，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一致。一清早，維也納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就报导說，談判已經毫無結果地破裂了，說中央工人委员会曾表示塔塔班雅扩大生产的問題要取决于一系列的政治要求——例如又一次要取决于是是否接受納吉参加政府（在这个时候，匈牙利居民对納吉的注意已經大为减退了）。有些外国記者听到了这些报导，就到国会大厦去，当时談判正在休会，記者們問工人委员会的委員們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委員們搖搖頭，他們一無所知。但是正当記者們还在那里的时候，来了几个人，把工人委员会委員們一个个地拉到一边，同他們交头接耳談了一陣，于是半小时之后，就宣布談判已經無結果破裂了，因为卡达尔拒絕了接受納吉参加政府。

这样，外国广播电台源源不断地給暴乱分子發出战斗指示——而国内暴乱分子还有很多，武器也有很多。12月初，薩尔茲堡的“匈牙利难民”营仍然是空着的。被派到匈牙利去的人，大概还没有回来，反革命还没有服輸，还没有

撤回自己訓練出来的兵馬。

11月最后几天，布达佩斯到处的牆壁上都忽然貼滿了招貼，宣布12月6日举行一次新的总罢工和一次新的暴动。12月6日是霍尔蒂·尼古拉斯的命名日。同时，各广播电台又一次加强了自己的宣傳；曾有一段时期每小时連續进行的播音，后来曾經稍有間断，現在又重新每小时都播音了。一切集中在“12月6日起义”这个口号上。而被再三宣布为匈牙利人民的真正合法代表的团体，就是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

到12月初，已經很明显，反革命已在准备再試一下自己的力量。在最近的日子里，人們看到卡达尔政府的威信已經加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重新工作了，大家日益强烈地希望安宁与和平的劳动。在某些企业里举行的工人委员会选举，結果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反动派。虽然有种种困难和种种宣傳，到处都有共产党人被选进工人委员会。

因此，反革命不能錯過時間。它必須再动手打击。每一个在这些日子里身在匈牙利的人都知道，这一次打击不会是很輕的。反革命将出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把当时仍然在混乱中的匈牙利再推入內战之中。如果当时手中国家机构还很薄弱的政府、当时还很年輕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能經受得住这个打击，反革命就会把匈牙利再度推入战斗和混乱之中。而且反革命还可以对全世界說：“看呀，只不过是俄国的刺刀鎮压着匈牙利，”于是那个要求徹底收拾各个“軟弱”的、“土崩瓦解中”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宣傳运动，就会重新煽动起来或是变本加厉。战争的危險又空前迫近了——而决定的地点将在匈牙利。

几天过去了。宣布在12月6日举行的暴动并没有举行，

但是夜里的槍击加紧了，在个别企业里，早上工作桌上放着一些从外面放进来的传单，号召罢工；不安全与不安宁的气氛加重了，印刷精美的号召对卡达尔政府作斗争的招贴，到处都出现，外国电台在忙碌万分。但是，12月9日，行动的却不是反革命，而是政府。政府解散了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

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是成立得比较迟的，它直到11月4日之后才开始活动。一开始它就不像大多数企业工人委员会那样处理生产问题，而是过问政治问题。它提出种种改变政府组织、改变对外政策的要求。很快就可以看出，原来反动派分配给了这个工人委员会以一个特殊的任务——它应该成为一个平行政府，最后并且成为一个公开的对台政府。正如在别的许多情况下一样，它的名字也是蒙骗人的。这个“工人委员会”也不是选举产生的。有个别的产业或是企业曾派了自己的代表去参加这个工人委员会，另一些委员则干脆自封为产业与企业的代表。

当从6日起实行总罢工与暴动的口号提出时，中央工人委员会并没有公开接受这个口号，它只是加重了自己的种种要求。在12月6日的那一个礼拜，政府宣布，举行集会必须事先通知，尤其是整个省份或是全国的代表聚集举行的集会。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工人委员会是企业的机构，应该处理生产问题——这种任务的规定，是完全符合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的意愿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对此的答复，是定于12月8日召开一次有全国各地代表参加的非法会议。会议的目的，定为筹备成立地区与州工人委员会。

但是，在这个会议上可以看到，甚至各个工人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是全都愿意开始对政府进行斗争，以使得中



央工人委员会和即将成立的地区与州工人委员会在形式上也成为一个对台政府。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一些代表宣布，如果政府不允許成立地区和州工人委员会，那么工人委员会就要号召全国总罢工，这时候，会场中乱了起來，有人插进一些喊声。有些外省代表，例如多罗格煤矿区的几个人，喊叫說：“別拿这些傻事情来扰乱我們了！我們希望最后恢复工作，商量我們自己企業的要求。”

辯論在繼續进行，情形已經很明显，总罢工的要求，大家是不会接受了。于是忽然有几个人闖进会场來，宣称自己是塔塔班雅矿工的代 表，喊叫說：“俄国人在塔塔班雅向工人开槍！死了四十人，重伤一百人！”

后来很快就查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个赶到塔塔班雅去調查这一事件的工人委员会委員們，在几小时后就証实了这一点。在塔塔班雅，廣場上的一个公共集会遭到了槍击，但开槍的不是“俄国人”，而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屋頂射手。虽然沒有人丧命，但是有四个人受了伤。但是，这个挑衅却暂时起了作用。到会者情緒激昂，跳了起來，許多人眼眶里还凝着泪水，大家决定举行一次四十八小时的总罢工，作为对“塔塔班雅大血案”的答复，这恰恰正是原来被大家所拒絕的总罢工。玩的什么把戏，現在是清楚了。到了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事情就更清楚了，到塔塔班雅去的人們回来了，他們去找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領導人，告訴他們說，塔塔班雅并没有發生什么大血案，所以罢工的決議应当取消。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領導人却直截了当地拒絕了。他們聳聳肩头，笑笑，說：“罢工是罢工，这个決議現在确定了，你們該高兴才是呀。”

代表們气憤極了，他們當場就宣布自己退出中央工人

委员会，然后去找政府，通知政府说，他们不再属于这工人委员会了，中央工人委员会用一个有计划的挑衅行动欺骗了工人。政府对这一点虽然已经知道，但是工人代表的这个声明和他们关于事件的报告，给了政府一个最后的证实。工人委员会被解散了。

现在，反革命得到了它原先寻找的斗争口号了；不光是一般的总罢工，而是抗议解散工人委员会的总罢工。反革命曾极力寻找冲突，但是政府现在不能避开这个冲突。它不得不起来较量一下力量。

早在8日，本来已经几乎完全停止了的射击，又重新开始了。恐怖分子集团变得小得多了，但是仍然存在。他们现在重新拿起武器来。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人群又有好几次受到枪击，显然有人打算重演10月25日国会大厦前面的挑衅事件。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些完全新的事情。各个“革命委员会”曾通过宣传画和招贴，号召在布达佩斯举行示威。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此的回答，是号召也举行一次示威。于是，将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有工人举着红旗游行走过布达佩斯的街道。他们人数不多，分成两队举行的示威也组织得不很好。因此，暴乱分子以为自己可以冒险出来打一场。当两队当中的一队在西车站旁边集合起来，演讲人正在向工人们讲话的时候，有人从好几方面向人群当中扔手榴弹，但是其中只有一个爆炸，幸而炸在一处空地上。同时，从好几方面喊出了口号：“打死共产党人！打倒犹太人！”——还喊了箭十字分子的几个老口号。

但是这一次情形跟10月的时候不同了。新警察坐着冲锋车赶到了西车站，不过他们来晚了；示威的工人自己已经

恢复了秩序。扔手榴彈的人和組織喊口号的人逃脫了几个，但是大多数被工人抓住，輕輕地揍了一頓。警察来得正是时候，他們把“自由战士”們載走了，有的送进監獄，有的送进医院。

但是反革命并不因此罢休。在后来的日子里，它努力設法重新打游击。在郊外各区，成群的恐怖分子挨家挨戶地到各商店去，向店主宣布說：“你們不关店，我們就把你們的門面全搗毀，甚至把你們也开槍打死。”有的人被吓怕了，关上了店門。但是另外有些人对“自由战士”們說：“滾开，要不然我們就找警察来了！”这在三四个礼拜以前也是不可能的：一来是因为誰也不敢这样說，二来是当时并没有警察可以找来。

虽然如此，一部分商店还是被迫关了門，包括一些粮食店。于是現在又出現了一个新現象——妇女們开始同“自由战士”們作对头了，而且是公开的。她們咒罵；她們說，現在总應該讓她們安宁了，她們希望能够买东西。她們該在哪里买到全家的食物，在“自由战士”們看来也許是無所謂的，但是她們妇女却認為很要紧。

在某一点意义上，妇女們在这些日子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已經宣布，这一次，罢工的日子决不再發工資了。这一次，大家已經知道，政府有力量貫徹自己的宣告。于是許多妇女就劝自己的丈夫說，他們决不應該再罢工了。因为聖誕节很快就要来到了，如果他們周末带不了錢回家，妇女們就不能买节日所需的东西了。这也起了影响。

10日和11日，有人多次企圖使电車交通停頓。在許多場合，忽然間出現了一些“起义者集团”，向滿載乘客的电車行列开火。在别的場合，他們拦住电車的路，用手提机关槍

指着，強迫電車工人和乘客下車，然後將電車推翻。在一些場合，他們居然做到使某一段路的交通停頓若干小時，在另一些場合，乘客們害怕坐電車，於是電車空着行駛。但是——這是一個新現象——在好些情況下，乘客們在電車被攔住的時候，跳下車，但並不是逃避武裝分子，而是向他們進迫，把他們趕走。在別的一些地方，警察又來了，但是這一次不帶槍，而是帶橡皮棍——這也就夠了。雖然如此，這些日子裏的交通當然搞得很糟。但是到處的電車站上都掛着黨的一幅宣傳畫。上面畫着在一個荒廢的電車站旁邊疲倦不堪地走着的一條黑腿。下面的字樣說：“你還想步行多久呢？別罷工了！”人們看到這幅宣傳畫，就喃喃地說：“的確對呀，我們徒步走路走夠了！”

從前在上面只看見各個革命委員會的宣傳畫和招貼的牆壁，現在也貼滿了黨的宣傳畫和招貼。除了各區所貼的簡單的文字宣傳畫之外，還已經有別的印刷的、在藝術上也有吸引力的宣傳畫。有一幅，上面畫凱特·珂勒惠支的一幅飢餓乞食的兒童圖，下面的文字說：“我們的孩子也要遭到這樣命運嗎？要工作，不要罷工！”另一幅招貼畫上面畫了兩隻手；一隻手拿着一大疊福林鈔票，另一隻手伸出去換取一盒火柴。下面寫着：“你們難道希望通貨膨脹嗎？工作吧！”

外國電台又增加了它們的廣播節目，經常不斷地向匈牙利國內廣播：“整個匈牙利在罷工！”、“內戰重新爆發！”、“匈牙利已經起義反對政府！”、“到處是巷戰！”。當時匈牙利人仍然辨別不出這些廣播的真相，不知道這是謊言和給反革命的指示，他們雖然不再完全相信——但是仍然相信一部分。“我們這裡安寧是安寧了，”許多人心中說，“但是廣播說的情況，也許在別的城市是真的。”國內重新緊張不

安起来，好像一个虽然过了危險期但是一經刺激或是加上負担就会复發的病人現在重新發燒一样。局势很不輕松，但是漸漸可以看到，政府和党已經比以前强大了。

有决定意义的問題是：“企業里的情况怎样了？”反革命能否再一次把工人拖进罢工去呢？共产党員已經漸漸在各企業里开始重新贏得工人的信任。并不是到处的工人都大多数贊同政府和党的政策的。在許多企業里，共产党員不得不首先为了爭取讓他們的党組織在企業中存在而斗争，因为工人們仍然說：“我們企業里不需要什么政党。”但是人們彼此已經开始了討論。反革命会不会把这一切都再度打破呢？

在12月10日至13与14日之間的几天內，有些企業根本就不工作，罢着工。在别的企業，这几天也几乎生产不出什么东西，因为只有一部分工人来上班，有許多人还不敢来，有許多人由于上班要步行而退縮不来了。但是一大部分的工人是来了，他們这几天从事修复工作。另一些企業則完全复工，或是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尽量开工。但是，总罢工是落空了。

已經說过，这几天工作作得不多。但是討論却很多。在布达佩斯一个有将近二千工人的大企業里，企業党組織共有四十一位同志。他們不得不进行了很久的討論，才在几个星期之前說服了人們讓他們进入这企業；現在人們向他們說，他們在企業里不需要有党办公室，工人委员会里也不需要他們。12月11日，党組織的主持人，一个在企業里工作了几乎三十年的工人，临时举行了一个全厂大会。工人們是到企業来上班了，但是沒有电，沒法工作，人們最后都到大翻砂車間去取暖。人們閑站着，党組織主持人也到了

那里，开始向一些在周圍站着的人述說 10月23 日之后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越來越多的工人走上前來，直到最後，整個車間的人都聽着他說話。黨組織主持人不但談到了 23 日之後的事件，而且還談到了目前發生的事件，談到了中央工人委員會的挑釁和解散它的原因，談到了將來為了使匈牙利工人處境更好，使他們的社會主義成果得到保障而應該採取的政策。緊接着這個臨時集合的大會，隨即進行了好幾個鐘頭的討論。很久之後，還有伙伴們到來，希望繼續討論下去。許多人說：“這一切我們從前都是不知道的。如果知道了這一切，事情就不會弄成那樣子了。”兩天之後，黨組織主持人和另一位同志被選進了工人委員會。使他們很驚奇的是：當提議採取某一些措施的時候，工人委員會里的其他工人開始問他們了：“你們黨對這方面有什麼意見呀？”有一次，黨組織主持人開玩笑地說：“你們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這樣重視我們的意見的呢？”工人委員會主席像受到了冒犯似地回答說：“當然啦，你們究竟是個工人黨呀，很明顯，工人委員會和工人黨應該聯合起來。”

在另一個企業里，只局部開工，某些車間的工人大部分上班了，其他車間只有部分工人上班。在這裡，共產黨人也挺身而出表示反對罷工，向工人們提醒說，政府是禁止給罷工的日子付工資的。有些人笑了起來，說：“這一點我們早已知道了，他們總是吓唬人，過後他們還是付工資的！”罷工後，工資沒有付，於是工人委員會就來找共產黨人，說：“你們應當幫助我們，有些伙伴家里有人，如果他們不拿錢回家，他們怎樣生活呢，而且他們老婆會大鬧一場的。”“我當時幾乎要脫口而出說：‘你們自己把事情弄糟了，現在自作自受吧，’”黨組織的主持人對我們說，“但是我們心里想，總

不能讓伙伴們听天由命不管呀。我們告訴他們說，工資肯定是不会付的了，这是應該的，不过可以同企業領導上商量一下，也許領導上可以預付給伙伴們一些錢，后来再分期扣除。这一来，他們回家就不会碰到老婆跟他們找麻煩了。工人委員會的伙伴們認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他們并不离开我們房間。我們等待了一下，于是他們当中有一个十分希奇地問：‘怎啦，你們不跟我們一起去找企業領導上談这桩事嗎？’我們說：‘我們去？我們又不是工人委員會的，應該你們去交涉才对。’但是伙伴們回答說，我們應該一起到那边去，我們这个办法好，如果我們參加談，一定会談得好些。下星期工人委員會就要改选，我們相信我們会有几个人选上。”

在別的企業里，这些天进行了十分尖銳而激烈的爭論。那里的工人委員會宣布說，解散中央工人委員會，是一个反动措施，它說明了共产党人是工人的敌人。一些同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仍然十分薄弱而人少的企業黨組織，別人對他們說：“要就是你們不再搞什么党，要就是你們滾出去。”一个共产党员回答說：“連霍尔蒂也沒有能够阻止我在这个企業里建立一个党支部，难道你們相信能够阻止我嗎？等到我們全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党还是会存在的。”伙伴們不作声，他們不再提把共产党人驅逐出厂的事情了。几天之后，两个工人委員會委員来找同志們，开始同他們討論政治問題。經過了討論之后，他們說，他們不久还要再来，因为大家一起来解決問題，比大家彼此对立來解決問題好。

在許多企業，在以前的几个星期內，卡达尔的名字几乎是一个罵人的字眼，人們稱他为“卖国賊”，人們說，他“出卖了匈牙利”。約在12月中，出現了一些新情况。在国会大厦

里面的那个給來訪各部部長的人們坐着候見的大廳里，可以越來越時常看到一羣羣的人，從他們的衣著看來，他們是直接從工作地點前來的。他們是一些在本企業里與某一廠長或是某一部里派來的全權代表有爭執的工人。“於是我們就動身，”他們每次敘述到最後總是這樣說，“找到了一輛大卡車，到國會大廈來找卡達爾·亞諾什——由他來斷定吧。”“賣國賊卡達爾”變成了“卡達爾·亞諾什”，人們來找他申訴，尊重他的斷定。

12月15日政府的白皮書出版了，里面敘述了納吉時期的事件始末，提供了許多關於白色恐怖的材料。還在幾個星期之前，一個發售政府材料的報販，他手里的全部書刊大概一定會被搶走，然後被撕碎或是燒掉。但是，這一天，報販們每一小時都要補充新的白皮書，因為它銷售得快極了。人們在許多地方甚至要排隊購買。許多人半生氣、半辯解地對報販說：“我絕不因為这样就全相信上面說的話。但是讀一讀是應該的。”

12月15日，已經很清楚，反革命這一仗是打輸了。總罷工落了空，暴動的企圖破了產。從第一天起就拒絕後退的政府，它的力量已經顯著起來了。黨的影響，尤其是在各企業，已經加強了。對於政府和黨所說的話，人們還有很多方面不同意，混亂仍然是很厲害的。但是人們已經願意彼此討論——以朋友的身分，以工人的身分，以匈牙利人的身分彼此討論。

在緊接着的下一個星期，到企業上班的工人人數比10月23日以來任何時候都多。在布達佩斯的馬路上，人們購買着聖誕禮物，排隊買最初一批聖誕樹。

匈牙利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就這樣結束了。直到今天，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还要对无数的困难作斗争；直到现在，党还面对着一个彻底赢得人民信任的任务，全体工人阶级还面对着一个彻底打败反革命、保障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个斗争将会继续很久，而且很艰苦，但是，生死存亡“千钧一髮”的关头，是渡过去了。

“在匈牙利，”卡达尔·亚诺什1月初在一个党积极分子大会上说：“现在再也没有惊人消息了。艰苦的工作是有的，需要克服的困难是有的，必须我们来解决的新问题是有的，但是惊人消息是沒有了。”卡达尔是在为欢迎一位伟大的贵宾——中国总理周恩来——而举行的大会上说这一番话的。在这次大会上，同志们起立，为已过去的斗争的殉难者——麦泽·伊姆雷、阿斯托洛什·亚诺什、拉考托什·彼得和其他许多人——默念致哀。许多男人和女人样子都显得苍白疲倦——他们的脸上带着许多天来进行武装斗争的痕迹，在无穷无尽的夜间通宵不眠进行工作的痕迹，好几个月来为了自力更生、白手在匈牙利重建起人民民主制度而奋斗的痕迹。他们亲身经历过白色恐怖，党的瓦解，新的、更好的党在艰苦与流血条件下的成立。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现在才刚刚真正开始。

当中国代表团和临时中央委员会一起进入会场的时候，同志们都站起来。他们鼓掌，他们挥手，然后开始欢呼。

他们欢呼的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一个领导者的名字，而是一件对他们说来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是代表了他们的生命的事物的名字。他们起初是分散地，后来却合声地呼喊了好多分钟：

“Éljen a párt! Éljen a párt! Éljen a párt!”（党万岁！党万岁！党万岁！）